

The background is a detailed painting of a harbor. On the left, a two-story wooden building with a gabled roof and a balcony stands on stilts over the water. A small sailboat with white sails is moored in front of it. To the right, a tall, white lighthouse with a lantern room at the top is visible. Another sailboat is moored further back. The water is dark with ripples, and a wooden post with a rope is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right.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屠洛涅夫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屠格涅夫传

×××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庄园童年·····	002
第二章	国内上大学·····	008
第三章	出国求学·····	014
第四章	开始文学生涯·····	023
第五章	《猎人笔记》·····	033
第六章	在法国·····	044
第七章	流放·····	049
第八章	培植文学新芽·····	058
第九章	开辟创作新路——《罗亭》·····	065
第十章	爱的痛苦·····	072
第十一章	《贵族之家》·····	079
第十二章	阴影·····	085
第十三章	“多余人”的结束，“新人”的开始·····	091
第十四章	一八六一年的改革·····	098
第十五章	创作最高峰·····	105
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111
第十七章	一切如“烟”·····	118
第十八章	走出“烟”之笼罩，走近革命青年·····	124
第十九章	扎根在祖国大地上·····	131

第一章 庄园童年

1818年10月28日，在奥廖尔省诞生了未来的伟大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孩子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是一个军官，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卢托维诺娃是一个富有的女地主。在小伊凡出生后不久，全家从奥廖尔迁居到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在母亲的大庄园里，屠格涅夫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时光。

斯巴斯科耶庄园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在她的精明打理下，田庄逐年扩大着。在屠格涅夫的记忆里，庄园就是树木的世界。茂密无路的松林，绿荫如盖的沙土小路，灌木丛生、坑坑洼洼的桦树林，还有林木花草构成的一条条转弯抹角的过道。园林里各种树木应有尽有，简直是个世外桃源。所以，屠格涅夫后来在晚年时常回忆起自己的幼年时代和一位家奴去园子的隐蔽角落去读诗的情景，他写道：“这些树木，这些绿叶，这些高高的青草遮住了我们，把我们跟其余的世界隔开了来，谁也不知道我们置身何处，我们身为何物——我们与诗歌同在，我们心中充满着诗意，我们陶醉在诗中……”

父母的专横、任性和古怪对童年时代的屠格涅夫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作用于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父亲并不过问家务事，总是忙着骑马出猎、玩纸牌、酗酒、向邻庄的少女献殷勤。屠格涅夫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自己的中篇小说《初恋》的自传性质，说其中描写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就如《初恋》里描写的那样古怪：“他几乎不过问我的教育，但也从来不屈服我；他尊重我的自由，对我甚至很客气……只是他不让我接近他。”孩子们的前途并不太使父亲焦虑，他主要是忙于自己的事，为自己的娱乐，为自己的安逸而操心。

如果说父亲对孩子不甚关心，那么母亲则如作者的短篇小说《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里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以一个草原女地主的全部热忱对他进行着教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个性情乖戾、激动易怒、心胸狭隘、任性甚至残忍的人。对待孩子，她有时焦虑不安地关怀着，简直温柔过分，有时又狠毒地虐待他们。作者在童年时代，常常为了一些琐碎小事就受到惩罚，挨打成为家常便饭。她对待农奴的残忍就更不用说了，随心所欲，任意鞭打侮辱他们。“我爱杀就杀，爱赦就赦”，这是她的口头禅。家中使唤大量奴仆，外出有整整一个车队跟随，任何人要见她，在一里到一里半路之外就得摘下铃铛，以免打

搅了她。庄园里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就迁怒于下人，大发雷霆。奴仆一见她神经质地飞快数着琥珀念珠，就明白她要大发雷霆了……

童年时期对斯巴斯科耶这段生活的印象深深地铭刻在屠格涅夫的心灵上，后来，这些印象在他的小说里都得到了反映。他曾说：“我的传记在我的作品里。”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一些性格特征常能从屠格涅夫笔下的某些女主人公的形象中看出来。《贵族之家》里傲慢的管家婆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中篇《普宁与巴布林》里威风凛凛的外婆，《地主私人事务所》里离不开琥珀念珠的太太，都能看出屠格涅夫母亲的影子。中篇小说《木木》中的哑巴农奴、小狗木木的故事就是取材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实际生活。

笼罩着斯巴斯科耶的专制气氛使屠格涅夫少年的心灵上产生了对农奴制度的憎恨情绪。他从来不把周围那些来自人民的人们，看作是“受过洗礼的财产”，他把农奴首先看作人，把他们当作朋友。有一次，母亲要把一个农奴丫头卖给一个最凶恶的邻居女地主，屠格涅夫则帮助把姑娘藏了起来，并拿着手枪冲着县警察局长和见证人说：“我要枪毙你们！”结果警察局长和母亲不得不让了步。屠格涅夫甚至把农奴当作自己的老师。第一个使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艺作品发生兴趣的是庄园里一个酷爱诗歌的家仆。作家在一部

中篇小说里提到过他，是以普宁的名字来描写他的，叙述了他带着“我”偷偷跑到庄园的树林里隐蔽起来读书的情景。

庄园的生活是丰富的。每到傍晚，设有舞台和乐队的正屋大厅里总要上演家庭戏剧，由农奴中的戏子、乐师、舞伎、歌手表演。有时在花园里点起油灯和各色灯笼，演戏招待客人。屠格涅夫后来还模糊记得搭在花园里大树下的露天戏台。他小时候在老家的储藏室里看见过著名诗人茹柯夫斯基到斯巴斯科耶庄园演出时戴过的饰有金星的魔术师的尖顶帽子。

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喜欢看书，尤其是法文书。在斯巴斯科耶大院的石头长廊里，有一间很好的图书室，藏有许多俄文书、英文书和德文书，但绝大多数是法文书刊。图书种类齐全：古典作品、现代小说、百科全书派的厚本巨册、历史和神话著作、世界各国的游记，还有很多植物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屠格涅夫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同那个他称之为老师的家仆一块儿偷书看。他偷看的第一本书是《象征与图谱》，后来在《贵族之家》里叙述拉夫列茨基的幼年时代时提起了这本书。屠格涅夫在家庭藏书中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大师，诸如莎士比亚、拜伦、席勒的原著。稍后不久，他又醉心于歌德的《浮士德》。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普希金的作品，对普希金的热爱贯

穿着他的整个一生。

少年的屠格涅夫，除了看书，吸引他的是大自然。他把斯巴斯科耶这个大庄园当作他的儿童乐园。他喜欢在这个大园子里游荡，喜欢钻进枝叶繁茂的树林里读诗。斯巴斯科耶花园尽头的池塘是他最爱去的地方。池塘里有很多鱼，甚至还有那时已经到处都逐渐在绝灭的嘉鱼。他就在这里喂鱼玩，把面包屑、麦粒丢给它们吃。7岁左右他就学会了设陷阱和用小网捕鸟，在斯巴斯科耶的花园里各种鸟雀应有尽有。

斯巴斯科耶的守林人和猎人发现这孩子对打猎有浓厚兴趣，就给他讲飞禽的生活、鸟类的飞行和习性。天气好的日子，他们就带他到森林和沼泽地去打猎，教他打枪。这样，他对打猎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种爱好使他很早就接近了平民，帮助他亲眼观察到真正的农民生活。

屠格涅夫是在贵族庄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童年时期对知识的渴求，对艺术和文学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以及对农奴的尊敬，对平民的了解，对他说来具有重大意义。

屠格涅夫9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孩子们被送进一所私立贵族寄宿中学，这里的教学情况并不好。作家的短篇小说《雅科夫·巴生科夫》就是他在寄宿中学里的感受的反映。在寄宿中学的学习，给

屠格涅夫留下鲜明印象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扎戈斯金的长篇小说《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俄语老师在业余时间给学生们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内容。他们屏息凝神地听着基尔什、强盗奥姆里亚施的奇遇……尽管这是一本很好的神奇小说，但屠格涅夫却认为它“没有表现出一点崇高的、巧合性的东西”。还在童年时代，屠格涅夫就充满了带浪漫色彩的美好幻想。那些“巧合的”情节，“崇高”的形象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离开中学以后，屠格涅夫和哥哥所受的教育便由一些家庭教师来进行了。诗人伊·彼·克留什尼科夫、莫斯科大学硕士德·尼·杜宾斯基都曾做过屠格涅夫的家庭老师，他们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家里的课堂上，屠格涅夫还学了医学、自然学、历史、绘画、德语、法语、英语等课程。

第二章 国内上大学

1833年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很严格，167名考生中只录取了27名。其中就有15岁的屠格涅夫，他考入了语文文学系。

莫斯科大学是当时俄国教育的中心，俄国的很多青年都以进此大学为荣。像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斯坦凯维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这些卓越人物都在30年代初期就学于这所大学。

30年代的俄国，继沙皇政府迫害十二月革命党人之后，又开始了残酷的反动统治。警察迫害和镇压制度猖獗一时，目的是要扼杀一切自由思想。尼古拉一世把大学看作自由思想的温床，而莫斯科大学成为他特别注意的目标。这所大学是当时进行政治探索的中心。斯坦凯维奇学生小组以及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后来成了开展社会政治斗争的最初的基层组织。

然而，反动派的猖獗行径不仅仅针对进步学生，还涉及到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按政治上是否可靠的原则挑选教授。所以，屠格涅夫便只好听一些枯燥无味的讲课。

但是，也有进步的善于思考的教授。其中最受爱

戴的是米·洛·巴甫洛夫教授。他讲的是物理和农业，但他常常引导学生们去关注哲学问题，他是德国哲学的传播者和宣传者。屠格涅夫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就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屠格涅夫在一年里听完了俄罗斯语文、通史、物理、拉丁语和法语这些普通班课程。在升级考试中，他总分得了36分，13名学生中有6名升到了二年级，他是其中之一。

但是，屠格涅夫已经不能再在莫斯科学习。1834年夏，他转入了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语言专业。他的哥哥这时已经在彼得堡开始担任军职，全家都迁到了首都。到彼得堡不久，屠格涅夫的父亲就中风死去，他的过早去世对亲人们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父亲去世前不久，屠格涅夫就开始创作诗剧《斯节诺》。该剧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是阅读拜伦作品后受的影响。戏剧题材取自意大利生活，具有与库科尔尼克趣味相投的传奇剧效果。两年以后他把自己的长诗交给普列特涅夫教授评判，屠格涅夫在大学里曾经听过他的课。

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生活的第一年，会见了诗人茹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母亲想要诗人想起她（在她做姑娘的时候，诗人曾去斯巴斯科耶庄园参加家庭演出），就派屠格涅夫给他送去她自己绣的天鹅绒靠垫。屠格

涅夫怀着激动而又胆怯的心情来到诗人居住的宏伟宫殿，诗人温和大度地和他攀谈起来。就是这次短暂的会见也足以使屠格涅夫在后来能用寥寥数笔勾画出一个惟妙惟肖的日趋衰老的诗人轮廓。

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同彼·亚·普列特涅夫教授最为接近。普列特涅夫是当时著名作家、诗人及批评家，他和普希金、茹柯夫斯基、巴拉登斯基、果戈理是朋友，是普希金最亲密的友人之一，普希金的《奥涅金》就是献给他的。屠格涅夫把剧本《斯节诺》递交给普列特涅夫教授。普列特涅夫读过后，对它作了严厉的分析批评，但又指出作品中还是“有点东西”的。屠格涅夫受到这几句话的鼓舞，很快又带给教授几首诗，普列特涅夫指出其中两首：《傍晚》、《致维涅拉·美吉采依斯卡娅》最为成功，并邀请屠格涅夫到他家里参加文学晚会。屠格涅夫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初试。

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果戈理在那里讲授古代世界史和中世纪史。但是学生们没有认出他就是著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作者，并且对他的任教评价并不好，他讲课无精打采。据屠格涅夫证实说，他“总是那么忸忸怩怩的”。果戈理之所以非常喜欢历史，是把它视为一种艺术素材，而不是当作一门教学课程。他的讲课并没有影响屠格涅夫对他

的尊敬：“他生来就是做同时代人师长的，只不过不是讲台上的师长而已。”

当屠格涅夫还是二年级学生时，他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季莫菲·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成为情投意合的好朋友，他们是同乡。两人都喜欢艺术、文学、科学，都醉心于诗歌。两人每次会面，都有诗歌朗诵这一项，有时是他们自己写的诗，有时则是他们喜爱的诗人的诗。

普希金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但奇怪的是他们既崇拜普希金，又赞美别涅基克托夫的工体诗。但是，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别涅基克托夫的庸俗文学给了坚决的打击，这打开了屠格涅夫的眼界，使他看到了别涅基克托夫创作的实质。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读别涅基克托夫的作品了。别林斯基的名字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印入了青年时期的屠格涅夫的脑海中。屠格涅夫当时也没想到，后来他同伟大批评家的个人交往在他一生中竟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1936年，他看了果戈理《钦差大臣》的首次演出，这次演出轰动了全彼得堡。虽然当时的屠格涅夫还没有能够透彻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但该喜剧确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暂时潜藏在他的意识深处，为他未来的现实主义创作做好了准备。

《国民教育部期刊》登出了屠格涅夫的第一篇铅印作品，是批评安·尼·穆拉维约夫的《圣地纪游》的文章，那时他还不满18岁。该文章发表后，他主要写些诗歌、长诗，翻译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李尔王》，拜伦的《曼弗雷德》，他自己很不满意这些译作，以后就把它们销毁了。

屠格涅夫经常参加普列特涅夫教授家里的文学晚会，认识了一些当时有名的文人。有一次，他刚到教授住宅的前厅，碰到了一位正在告别的客人。屠格涅夫不认识这个人，他中等身材，声音洪亮。屠格涅夫只来得及看清他的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一对灵活的眼睛。这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一向崇拜的神仙般的人物。在一切都弄清楚以后，屠格涅夫觉得非常懊悔。

屠格涅夫再次看见普希金，是在1837年初诗人逝世前不久的一次音乐会上，那是诗人一生中最痛苦、最困难的时期。“他站在门旁，倚在门框上，双臂交叉在宽阔的胸膛上，带着一副不满的神态不时地望着四周。我还记得，”屠格涅夫后来回忆说，“他的黝黑的、不大的脸庞，他的非洲人的双唇，露出一口洁白大牙，下垂的连鬓胡子，一双黯淡的黄眼睛，高额角下几乎没有眉毛，一头卷曲的头发……”等过了几天再见到普希金时，他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屠格涅夫不由地自言自语地重复：

“他躺着一动不动……”

“他的宽广前额显得古怪的苦痛……”

也是在普列特涅夫家的那次文学晚会上，屠格涅夫见到了诗人柯尔卓夫。当时他穿着一件旧式的长礼服，谦逊地坐在一旁，两眼流露出大智大慧。他拒绝了主人让他朗诵自己诗作的请求。将近半夜时分，客人几乎全都已经离去，屠格涅夫送诗人回家。一路上，两人交谈着，屠格涅夫问他为什么不肯朗诵自己的诗歌。柯尔卓夫懊恼地回答：“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即普希金)刚走出去，而我就去朗诵！饶了我吧！”这些话充满着对普希金的敬仰。

1936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毕业，获得“优秀生”称号。屠格涅夫没有就此罢休，因为他决心再听一次三年级的许多课程，而且再度参加考试。1837年10月，经过顽强的学习和复杂的大学考试，他取得了副博士学衔。

第三章 出国求学

本来就有进入伟大小说家行列的天赋的屠格涅夫却长时间地向往着从事科学活动，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俄国的进步人士都悉心研究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以及费尔巴哈的著作，热衷哲学是30年代俄国大学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年轻的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决心到柏林去继续求学，研究哲学。

屠格涅夫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最喜爱的儿子，她对她的爱自私而任性，然而却是始终如一的。儿子越长越大，她对她的眷恋也越厉害，要是长久接不到儿子的信，就会觉得莫名的恐惧。因此屠格涅夫的出国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可是儿子偏要挣脱开这个地主俄国，哪怕是暂时的。过了三年之后，屠格涅夫才公开说出他所以要出国的主要动机是因为仇视俄罗斯地主专制制度，而当时他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母亲是个坚定不移的农奴主。

最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不得不让步，派家仆中当医士的波尔菲利·库德里亚舍夫陪同屠格涅夫去柏林。1838年5月，屠格涅夫乘“尼古拉一

世”号轮船去德国的吕贝克。这次航行使他永生难忘。轮船载有近300名旅客和28辆马车(许多人打算到了吕贝克以后乘自己的马车继续赶路)。突然，船上着起了大火，火借风势，底舱里的煤烧着了，马车着了，凡是能燃烧的东西都着火了。人们惊惶失措地拥到甲板上，奔向舢板，惊慌中舢板被沉入水中。屠格涅夫不会游泳，他吓得魂不附体，抓住一个水手的胳膊，答应对方，如果救了他的命，他那有钱的母亲可以付1万卢布作报酬。后来，作家本人每当忆起自己在那条起火的船上狼狈不堪的孩子相，就会哑然失笑。在逝世前不久，身患重病的屠格涅夫虽然已无力写作，仍口述了一篇特写《海上大火》，详细地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

1838年9月底，屠格涅夫在柏林住下了，开始去听大学的课程。听课之余，他常去看戏、听音乐、到几个熟悉的同胞那里去。

当时的柏林连一点都市生活的影子也没有，而柏林的大学和科学使这个城市具有一个欧洲运动中心的性质。柏林大学对苦干和实干的要求，比在俄国要高得多。屠格涅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俄国是一个挺不错的“副博士”，可是在柏林听完大学者讲授的古代文学史和古希腊罗马艺术史课程后，还得在家中重新啃拉丁语法和希腊语法。柏林大学的教授中有在

科学界享有盛名的里特尔、兰克、萨维尼、韦德尔、汉斯等。

屠格涅夫在韦德尔教授的指导下特别勤勉地研究黑格尔的著作。韦德尔教授心地非常纯洁，甚至有点天真，在他的课程里提出了人的伦理道德和尊严问题。学生们都很爱戴他，在他窗前举行祝歌晚会。屠格涅夫、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都喜欢他，斯坦凯维奇是他的挚友，别林斯基甚至通过通信就喜欢他了。屠格涅夫称赞他是“一个神奇而又圣洁的人”。

屠格涅夫在柏林遇见了彼得堡大学的好友格拉诺夫斯基，经他介绍，认识并接近了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对三四十年代思想活跃的俄国年轻一代有着巨大的意义。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把斯坦凯维奇称作30年代“使莫斯科年轻一代热衷于黑格尔学说的第一宣传者”。屠格涅夫没有能在莫斯科加入斯坦凯维奇小组，他那时还太年轻。到他住在柏林时，这种年龄差别已经不大明显了。因此，就在柏林，他进入了斯坦凯维奇的朋友的行列。

屠格涅夫并没有一下子就博得斯坦凯维奇的好感。他开头显然对屠格涅夫并不赏识，只是同格拉诺夫斯基交往得相当频繁。屠格涅夫后来思索过斯坦凯维奇和格拉诺夫斯基起初与他疏远的原因。他勇于自我剖

析，认为自己那时还配不上和这样纯真、坦率和完美无瑕的人交好和接近。屠格涅夫早就具有这种自我剖析的习惯，难怪他在17岁时读完了卢梭的《忏悔录》以后，就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部忏悔录。

当时柏林有一个退役军官叫弗罗洛夫，同斯坦凯维奇小组很接近。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常常在弗罗洛夫家聚会。一些演员、文学家、旅行家、学者也经常参加这家举行的沙龙。显然，屠格涅夫由于年轻还不能无拘束地显露出能言善辩的本领。“我到那里去，”他说，“张着嘴巴默不作声，一味听着人家讲。”

除了聚会，如果精神倦怠，他就去听音乐、看戏，音乐和戏剧成了他的真正需要。他听过格鲁克、莫扎特、贝里尼的歌剧，贝多芬的交响曲和奏鸣曲；看过莎士比亚、席勒的戏剧。这些都抑制了莫名的忧虑，排遣了郁积心头的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孤独之感。他对音乐的爱好使他抱怨母亲儿时惩罚他时没有强迫他弹奏乐器。

尽管屠格涅夫已经20岁，他身上却还有很多孩子气的东西。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去看屠格涅夫时，不止一次地碰到这样的情景：屠格涅夫正和陪伴他的波尔菲利一起沉醉于玩纸人小兵的游戏，他们互相把对方的纸人轮流打倒。他还在小猫尾巴上系上一片纸，

欣赏它怎样活蹦乱跳地抓那纸片。

1839年春天，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寄来一封信，说由于一个车夫的妻子点烟熏生了小牛犊的母牛以消灾除病时，火星落到麦秸上造成庄园失火，诺大的斯巴斯科耶烧光了。并给他寄来路费，让他回家过圣彼得节。

夏末，屠格涅夫回到了俄国，在斯巴斯科耶住了三个月，前往彼得堡，准备从那里再度出国。就在彼得堡，他有幸两次见到了他所爱戴的诗人莱蒙托夫：一次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另一次是在贵族俱乐部的除夕化装舞会上。

当时，莱蒙托夫已经名噪一时，人们把他当作普希金的继承者，上流社会极力要把这位诗人拉进自己的圈子，使之不再惹是生非。莱蒙托夫被命运驱使到这狭窄的天地里，深知这群人薄情寡义，颇感寂寞和苦恼。他后来在向洛普辛娜解释为什么他愿意跻身“贵族社会”时写道：“这一新的阅历是有益的，因为它给我提供了反对上流社会的武器。”

屠格涅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他见莱蒙托夫的情景：“莱蒙托夫的外貌，看上去仿佛带着一种不祥和忧伤，从他那黝黑的脸上，从他那双凝然不动的黑色大眼睛里，让人感觉出某种郁闷和仇视，感觉出某种深沉的鄙视和激情。他那沉郁的目光，同他那几乎

像孩子般温柔、位置显得突出的嘴唇的表情，极不相称……也许莱蒙托夫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很深的痛苦；命运把他领入这个社会环境，这个环境里的压抑气氛使他感到窒息。在贵族俱乐部的化装舞会上，人们也不让他安宁，朝他靠拢，挽住他的胳膊，戴假面具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他几乎没有换地方，默不作声地听着他们那种无聊的吵吵闹闹，那双郁郁寡欢的眼睛，挨个地扫视着他们。”只有敏锐觉察诗人内心悲剧的人才能如此清晰地勾画出莱蒙托夫的非凡外貌，如此准确地表达出诗人在上流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寂寞和苦闷。

莱蒙托夫的创作，把“充满痛苦和怨恨的冷酷无情的诗篇”投向俄国当权的上层，给年轻的屠格涅夫的诗作，特别是叙事诗以很大影响。莱蒙托夫艺术创新和心理剖析手法，在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840年仲春，屠格涅夫到达罗马，碰见了身患重病的斯坦凯维奇，开始同他密切交往起来。两人经常到一个叫霍夫林的朋友家去聚会，屠格涅夫喜欢上了霍夫林的长女亚历山德拉，并为她写诗《月儿穿过那灰白的云幕》，可是亚历山德拉暗恋的是斯坦凯维奇。后来，屠格涅夫在创作《贵族之家》时，又记起了他钟情于亚历山德拉·霍夫林娜的时候，并把那

首诗写进了这部作品。

屠格涅夫在罗马，几乎每天都长时间地出外游览，科洛西姆大斗兽场、集议场遗址、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雕塑绘画博物馆大厦、著名的地下陵墓……几乎游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多年以后，屠格涅夫把1840年留下的罗马印象写进了短篇小说《幻影》。

后来，屠格涅夫去了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海湾的美丽和安乐永远地留在他记忆里。他在三年之后的长诗《帕拉莎》中是这样写那不勒斯夏日的景色：“大海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忽儿汹涌，忽儿喘息，忽儿沉寂……”

屠格涅夫跑遍了意大利和撒丁王国，身上的钱快用完了，于是徒步旅行到瑞士。在瑞士那冰川绿湖、奇峰深谷的旖旎风光中，屠格涅夫陷入了一种拜伦式的苦恼，他觉得生活是多余和乏味的，甚至想与生活诀别。在他后来写的一首散文诗里，流露出产生当时那种心情的原因：“我那时住在瑞士，很年轻，自尊心强，但又很孤独。我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这体现了22岁青年正处于弱冠年龄的特有的内心世界。

在返回柏林的途中，他在歌德的故乡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随便走进一家点心店去喝柠檬水，就在那里看到了店主的女儿，一位十分美丽的年轻姑娘。这位姑娘惊慌不安地向他求助，救救她昏迷不醒的弟

弟。屠格涅夫和这位姑娘偶然相遇，爱慕之情顿生，只是因为急着离开才抑制住了这股柔情。这一段意外而又浪漫的经历30年后终于成了中篇小说《春潮》的素材。

到达柏林不久，屠格涅夫就得知斯坦凯维奇已于6月24日逝世，不久他认识了斯坦凯维奇在莫斯科小组时的挚友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他们是在共同的亲密朋友的墓地上建立起友谊的。他们的性格迥然不同，屠格涅夫温和谦逊，而巴枯宁倔强冲动，但不同的天性并没有妨碍两人的亲密交往和相互倾慕，虽然巴枯宁比屠格涅夫长5岁，但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巴枯宁是个血气方刚、性格刚毅、十分热情、具有巨大活力的人，他的某些特点，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身上体现出来。屠格涅夫以认识巴枯宁为最大的幸福，而巴枯宁则经常给俄国的家人们通信说屠格涅夫是他的挚友，和屠格涅夫的友谊是他一生中值得庆幸的事件。两人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们简直从早到晚整天用功。休息时，要么下棋，要么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争论时，屠格涅夫总喜欢坐在火炉旁，巴枯宁则喜欢靠在沙发上。两人晚上多半到巴枯宁的姐姐瓦尔瓦拉·亚历山罗夫娜那里去，两姐弟经常谈到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这使屠格

涅夫对住在普列姆兴诺的巴枯宁一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841年春，原定的大学课程都已学完，屠格涅夫准备回国。巴枯宁写信给弟妹们，要他们好好接待屠格涅夫。

第四章 开始文学生涯

屠格涅夫回到了斯巴斯科耶，瓦尔瓦拉·彼罗夫娜见到儿子感到幸福，而家仆们则欢天喜地说：“我们的天使来啦，替我们说情的人来啦。”母亲一心想讨宝贝儿子的喜欢，叫人做他爱吃的东西，把一罐罐他爱吃的果酱送到他房间去，而他却用它来招待农奴的孩子们。他还是那样喜欢和别人逗笑、淘气、胡闹，他曾带着母亲的养女去“扫荡”食品橱，弄得省吃俭用的老家人大惊失色。

在斯巴斯科耶安谧宁静的生活中激荡起了一阵波澜：屠格涅夫爱上了莫斯科一个平民的女儿，叫阿芙多吉娅·叶尔莫拉耶夫娜，她是雇来斯巴斯科耶当裁缝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得知后，勃然大怒，把姑娘赶出了斯巴斯科耶。阿芙多吉娅无奈，怀着身孕回到莫斯科，孩子生下不久便被送往斯巴斯科耶。阿芙多吉娅后来嫁与他人，屠格涅夫每年都给她一笔生活费。《贵族之家》中有关拉夫列茨基的父亲爱上一个农奴姑娘的故事，实质是屠格涅夫在追述他对阿芙多吉娅的热恋情景。

1841年9月，屠格涅夫离开斯巴斯科耶前往

莫斯科，准备参加硕士考试，还参加了文学小组和文艺沙龙的集会。

到达莫斯科不久，屠格涅夫探访了住在普列姆兴诺的巴枯宁一家，在那里度过了6天。屠格涅夫热恋巴枯宁的妹妹塔吉扬娜·巴枯宁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早在屠格涅夫到来之前，她就从哥哥和姐姐从德国写来的信中了解到屠格涅夫是个生气勃勃、学识渊博、善于谈吐的诗人、哲学家、机智俏皮的交谈者，不禁对他产生了无限的崇拜。现在，她理想的爱人终于来了，她欣喜若狂，以崇敬仰慕的心情听着屠格涅夫谈话，她疯狂地迷恋着他。塔吉扬娜不但美貌，而且很有教养，博览群书，具有音乐天才，精通数种语言。屠格涅夫也喜欢上了她，但他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关系会发展到如此深情的程度：当塔吉扬娜对他迷恋得生了病搬到了莫斯科自己姨母家去住的时候，屠格涅夫还不知道她得病的原因。尽管塔吉扬娜那么可爱，感情又那么深沉，但屠格涅夫明白，他不能用同样深的感情来回答她。他感到矛盾、不安、为难、内疚。1842年春，两人终于分手。

和塔吉扬娜·巴枯宁娜的这一段爱情在屠格涅夫40年代初期的许多抒情诗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如《久久飘着的白云》、《把手伸过来——让我们到田野里去》、《涅瓦河》、《当我和你分手之后……》等。下

面是一首诗的片段，作于1842年：“把手伸给我，让我们同到野外／我沉思的心灵之友……／忘却一切哀痛，一切怨恨／也忘却我们的别离／请相信：我万分感动，我无限羞愧／我那整个心灵一直向往着你……”

屠格涅夫在莫斯科一方面认真准备哲学硕士的考试，一方面又经常在《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本杂志上以“屠·卢”的笔名发表诗作。他自己也难以确定将来是当诗人还是学者。他的一些熟人没有把他视为诗人，而是把他看作准备在大学里担任哲学教授的学者。阿·费特在谈到和屠格涅夫初次在莫斯科大学教授舍维廖夫家见面时的情景时写道：“房间里走进一个高个子青年，深褐色的头发，留着当时流行的‘李斯特’发式，穿着一件纽扣一直扣到衣领的黑色长礼服……他走后教授对我说：‘这位屠格涅夫真是怪人，前两天带来一篇长诗《帕拉莎》找我，今天却又张罗着到莫斯科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的事。’”可见在屠格涅夫身上有着双重爱好——科学工作和文学。

然而尼古拉时代，俄国帝制的维护者把哲学视为自由思想和追求解放的一种危险根源，俄国大学已经废除了哲学课，屠格涅夫渴望当哲学教授的希望破灭。

1842年夏天，屠格涅夫被巴枯宁叫到德国。当时，巴枯宁已决定不再返回俄国，成为一个政治侨

民居住在欧洲，一头扎进无政府主义政治斗争中。屠格涅夫回国时，接受了巴枯宁交给他办的许多事情，并带回一些印刷品，两个人都担心边境检查，怕这些印刷品会招致警察的迫害。

1842年12月初，屠格涅夫回到彼得堡。此时，想当哲学教授这一宿愿已化为泡影，他开始加倍努力地进行创作活动。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1843年确实是他开始文学生涯的标志，这一年他完成了长诗《帕拉莎》。

在这部诗作之前，屠格涅夫已经从事各种体裁的创作近10年，他曾写过评论、剧作、短篇小说和短篇叙事诗。由于屠格涅夫对自己要求严格，毁弃了这些习作中的许多作品，对于一些发表过的诗作，后来被作者认为很不成熟太平庸而不同意把它们收入选集中去。

1843年初，屠格涅夫写了长篇叙事诗《帕拉莎》，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人通过对外省地主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表现了这些人的空虚和卑鄙是怎样扼杀青年时期的美好感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女主人公帕拉莎本来具有丰富的精神禀赋，她的意中人竟是个平庸之辈，于是婚后的一切都变得那样市侩。屠格涅夫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体“诙谐故事”的传统，随意而谈，顺便插入讽刺，但是在诙谐抒情的

轻松中却隐藏着严肃而深刻的问题。作者把莱蒙托夫的诗句“我们的恨，我们的爱，都是偶然的”作为这部长诗的卷首题词。

虽然打开俄国文学史新篇章的并不是屠格涅夫的叙事诗，而是40年代末的《猎人笔记》，但写诗对年轻的屠格涅夫来说是锻炼写作技巧的好机会，可以锤炼语言，学习音律，使语句形象生动、鲜明简炼。

长诗的出版和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对它的好评，是年轻的屠格涅夫命运中的两项重大事件，为他40年的漫长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长诗出版成小册子后，屠格涅夫给别林斯基送去一本。他没有自报姓名，只是让仆人转交。他去斯巴斯科耶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祖国纪事》五月号刊登了别林斯基评论他的长诗的文章。批评家对此诗备加赞誉：“长诗显示了非凡的诗才，准确的观察力，揭示了俄国生活秘密的深刻思想，优美、微妙、隐藏着丰富感情的讽刺——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除了创作才能之外，他的胸中怀着时代的一切悲痛和疑问，他是我们的时代之子。”别林斯基的赞誉之词使屠格涅夫感到难为情，以致当别人祝贺他的成功时，他竟拒绝承认长诗是他的作品（他是以“屠·卢”的署名发表长诗的）。

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候起开

始的，这是屠格涅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别林斯基同屠格涅夫见过最初几次面后，就对他赞誉备至：“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跟他谈话、争论，使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他是个有自己的见地，有独特看法的人。在他的意见和你的看法相冲突时，那真是针锋相对，会迸出火星……他了解俄罗斯。从他的所有见解里都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骨气的、实事求是的人。”别林斯基喜欢屠格涅夫丰富的想象、敏锐的思想，也喜欢他那善良温和的性格。

别林斯基很重视屠格涅夫，还在于屠格涅夫是个非常熟悉最新哲学思潮的人。当时，别林斯基思想上最关切的问题是哲学，他正在探索一种能为改变现有俄国农奴制度指出途径和手段的正确的革命理论。而在和他交往的文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和他就哲学思想理论问题进行辩论，而且他那激烈的性格、旺盛的精力，需要的是交流思想，争论问题，同势均力敌的战士进行交锋。因此，屠格涅夫的出现，使他感到很高兴。他觉得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别林斯基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

1843年4月，当屠格涅夫前往斯巴斯科耶小住时，别林斯基写信给他说：“再见吧，最亲爱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上一次没能跟您谈一谈，我感到

非常遗憾。您的谈话总使我觉得心情舒畅。当我有一段时间无法跟您交谈时，我更感到它的可贵。”后来，别林斯基又多次跟朋友们谈道：“我非常敬爱彼得堡的朋友们，不过他们之中谁都没给我什么影响。我最感宝贵的是屠格涅夫的聪明才智。”“离开屠格涅夫我就孤苦伶仃，凄然泪下了。”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的友谊持续了将近5年，直到1848年别林斯基去世时才结束。这段深深的友谊对于屠格涅夫的文学生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接近别林斯基之前，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多少带有偶然和客串的性质，是别林斯基使他改变了对写作活动的看法。屠格涅夫曾认为领取稿酬有损尊严，情愿把应得的稿费送给杂志的编辑。别林斯基为这事而责问他：“您竟认为因您的脑力劳动而付给您钱，是一种耻辱？我真为您感到羞愧和痛心！”从此，屠格涅夫对作家的劳动再也没表示过这种奇怪的看法。

在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也开始撰写评论文章，成为《祖国纪事》以及后来于1847年改版的《现代人》的积极撰稿人之一。在和别林斯基交好作为标志的40年代，屠格涅夫成了一个文学家，而且是杂志撰稿人，以前他只不过是诗人。

别林斯基不仅看到屠格涅夫具有卓越的创作天赋和非凡的聪明才智，他还很重视屠格涅夫对社会各阶

层群众的心理状况与生活习惯的细致入微的了解。他们共同的对被奴役祖国的爱，对农奴制的憎恶，对俄罗斯人民美好未来的信念，也使他们相互接近。

屠格涅夫对社会的关切，他的政治、哲学以及美学观点在别林斯基影响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别林斯基的开导下，屠格涅夫明白了文学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别林斯基是领导俄国果戈理派现实主义作家运动的伟大批评家，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认为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强大武器，主张为生活而艺术，捍卫合乎时代现实需要的社会艺术。他主张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主张创作具有深刻的内容、为人民喜闻乐见、充满生气的诗歌。在别林斯基影响下，屠格涅夫在自己的创作中确定了现实主义方向。因此，屠格涅夫从写作诗歌转向写作散文，写作《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紧迫鲜明。屠格涅夫性格柔弱，喜好自我分析，忧伤郁闷，爱观察，这一切同他那颗勇于探求、有强烈爱憎的热情奔放的心，发生了冲突。当时在俄国，没有人能比别林斯基更为深刻地向屠格涅夫揭示事物的真理，使他的认识走上正轨。他们一起长时间地思索、讨论那个时代的优秀人物所深感焦虑的

一些重大问题。

1844年，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在彼得堡郊外的别墅里度夏，两人住得很近。屠格涅夫每天都去看望病中的别林斯基。天气晴朗，两人常常在松树林中漫步畅谈。每当屠格涅夫感到疲劳，显露出青年人的浮躁脾气，想去游玩、休息或吃饭时，别林斯基就苦笑着责备他说：“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我们还没解决，您就想吃饭了吗？！”

后来，屠格涅夫说过，对他影响特别大的主要还不是别林斯基的文章，而是和他的交谈。这种影响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屠格涅夫各个时期的创作活动中。

别林斯基关注着屠格涅夫创作才能的发展，他在世时屠格涅夫发表的全部作品：长诗《帕拉莎》、《谈话》、《地主》、《安德烈》，剧本《疏忽》、《囊空如洗》，最初的几篇散文《安德烈·柯洛索夫》、《三幅肖像》、《好决斗的人》、《猎人笔记》中最早的几个短篇，在他的评论中几乎都提到过分析过。别林斯基把诗人屠格涅夫看作是可能继承莱蒙托夫诗才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把他也称作“时代之子”，是说他们俩的作品都反映出了时代的性质，胸中郁积着所有的悲伤和疑问。

继《帕拉莎》之后，屠格涅夫开始探索长诗新的主题与风格。他的第二部长诗《谈话》是莱蒙托夫式的主题，反对周围现实的鄙俗，通过父与子的尖锐问

题，考虑了青年一代的前途。但此诗采用的完全是赤裸裸的政论写法。另一部长诗《地主》则是果戈理式的讽刺，揭露庄园主的俄国和农奴制度的守旧与野蛮。但这两首诗都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热情肯定。

屠格涅夫和当时的青年诗人涅克拉索夫都赞同别林斯基关于现代文学的基本观点，他们作为《祖国纪事》杂志的盟友，争取建立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学派。屠格涅夫撰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嘲笑自己曾经崇拜过的偶像如别涅基克托夫、库科尔尼古等一些“浪漫主义”中坚人物的作品，针对他们的修辞诗学，提出了现实主义手法和文学的人民性原则。

这时，屠格涅夫的文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已开始形成。

第五章 《猎人笔记》

1843年，屠格涅夫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别林斯基，决定了他文学生涯的开始，另一个就是意大利著名女歌唱家，22岁的波丽娜·加尔西娅·维亚尔多。就是从那时候，他开始了一种占据他整个身心甚至一生的爱情，他想永远忠贞于一个女人，然而对方却没有成为他的妻子。

1843年秋天，波丽娜·维亚尔多随同意大利歌剧团访问彼得堡。波丽娜·维亚尔多出身于西班牙贵族家庭，早在幼年时期就已开始演唱。在来彼得堡之前，她已嫁给一个法国文学家兼翻译家、共和政体的坚定拥护者路易·维亚尔多。

她虽然青春年少，但已经誉满欧洲。30年代末，她在布鲁塞尔、伦敦演出时获得巨大成功。18岁时饰歌剧《奥赛罗》中的苔丝德蒙娜，受到音乐界巨星泰斗的赞赏。诗人们为她赋诗，作家们热情谈论着她扣人心弦的歌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还把她选作自己小说女主人公康素爱萝的人物原型。

维亚尔多在彼得堡，演出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罗丝娜。她刚出现在舞台上

的那一刹那，并没有给人特别的印象，观众只是觉得她“不漂亮”。但当她刚一展歌喉，奇迹就发生了，大厅里死一般沉寂。不久，急促的“好！好！”喊声时时打断了她的歌声，她的咏叹调还没唱完，就传来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波丽娜·维亚尔多的外表并不是很美，小小的个子，漆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脸盘不太端正，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但她的天才却使屠格涅夫倾倒，这个歌剧团的每一场演出他都必到不误。

据说，当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得悉儿子又有了新的爱好之后，对待波丽娜·维亚尔多就像仇人一样。但是她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女歌唱家的卓越才华。一次，她上午去听她的音乐会，回家以后非常生气，因为她的儿子没有回来吃午饭。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她生气地用刀敲着桌子，自言自语地说：“应该承认，该死的吉卜赛女人唱得很好。”

屠格涅夫经人介绍与波丽娜·维亚尔多认识以后，便与她以及她的丈夫路易·维亚尔多密切交往起来，他认为路易是一位有广泛文学爱好的人，也是打猎的伙伴。后来，路易·维亚尔多就成了屠格涅夫著作的法文译者。屠格涅夫和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交往，随着岁月流逝，变成了牢固的眷恋之情陪伴着屠格涅夫的一生。从青年时期一直到临终，屠格涅夫始终怀着

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为此作了很多牺牲……

随着屠格涅夫在文坛上声名日振，他的交游越来越广，通过别林斯基，他结识了一些年青的文学家。跟同时代的人比较起来，屠格涅夫算是个幸运儿，没有哪一位俄国作家一生之中能像他那样结交那么多伟大杰出的人物，有那么多知心朋友的友好来往。少年时代，他亲眼见过茹柯夫斯基、果戈理、普希金、柯尔卓夫、莱蒙托夫这些文学界出类拔萃的老前辈。大学时期，他结交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斯坦凯维奇、巴枯宁。刚走上文学道路，他就和别林斯基建立起深厚友谊，并结识了后来跻身于最伟大的俄国作家之列的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

40年代中期，别林斯基小组的一批作家同《祖国纪事》的发行人发生决裂，于是决定脱离《祖国纪事》，改版《现代人》作为自己的刊物，使之成为与当代先进的社会运动密切联系的一本真正合乎时代的杂志。屠格涅夫为创办这个刊物和诗人涅克拉索夫一起奔忙张罗、出谋献策。

夏季到了，屠格涅夫要回故乡斯巴斯科耶去度假。就在这年即1846年的夏秋两季，屠格涅夫一直沉醉于打猎，为他后来的《猎人笔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屠格涅夫童年在斯巴斯科耶庄园时，就对打猎产

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听守林人和猎人讲打猎的知识，并和他们一块儿到森林和沼泽地去打猎。从此，“打猎”就成了他的一大迷恋。这次，他在庄园的整个时间里几乎没有离开过猎枪，笔连碰都没碰。一提到打猎，他就忘掉了一切。他深知打猎是俄国人的特色，了解俄国的打猎史。说起弗拉基米尔时代的勇士在草原禁区打过白天鹅和紫膀鸭，摩诺马赫在遗嘱中描绘的和原牛、熊搏斗的情景，他如数家珍；对于种地人穿一双树皮鞋，用绳子扎起来的枪打猎，他更是了如指掌。

在庄园休假的这段时间，屠格涅夫背着猎枪走遍了奥廖尔省和附近的几个省。经常陪他打猎的是一个地主家的猎场看守——农奴阿法纳西·阿里凡诺夫。在那一带，谁也比不上他的打猎本领，他能靠嗅觉找野鸟，招引鹌鹑，孵育小鸟，捕捉夜莺。屠格涅夫十分喜欢阿里凡诺夫，帮他赎了身，让他搬到离斯巴斯科耶不远的森林里居住，屠格涅夫空闲时经常去他家小坐饮茶、谈打猎、拉家常。

屠格涅夫利用打猎的机会，到过荒僻的村舍、地主的庄园、草原上的猎场和森林的看守棚，还乘着马车访问了邻近的几个县。打猎培养了屠格涅夫沉着冷静、忍耐刻苦的品质，使他接近大自然，了解自然的奥秘，更重要的是：打猎使他接近普通人民，仔细观

察了农民与地主的生活，如饥似渴地汲取民间语言，促使他理解并爱上俄国农民。

当屠格涅夫带着丰富的素材满载而归，回到离开快半年的彼得堡时，《现代人》第一期正在筹备中。屠格涅夫向别林斯基保证，他一定以最好的作品支持《现代人》。

自意大利歌剧团离开俄国后，屠格涅夫一直和波丽娜·维亚尔多保持通信联络。1846年12月他给正在柏林歌坛进行冬季演出的波丽娜·维亚尔多写信说：“我现在有许多工作，几乎和谁也不见面。闭门写书，这是我从天南海北搜集来的，是我的希望与回忆。”“我正全力以赴地在写作，我答应写一些东西，我想要办到，也一定能办到。”

屠格涅夫给第一期《现代人》写的短篇题为《霍尔和卡里内奇》，副题是《选自猎人笔记》。这篇作品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扬，作者的声望提高了。别林斯基深信，从《霍尔和卡里内奇》这篇看来，屠格涅夫的创作前途无可限量，而且已自成一家，将是未来一位卓越的作家。读者都纷纷来信问《现代人》是否还继续刊登猎人的故事。

后来，刊物上又陆续发表了以下几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郭甫》、《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这使屠格涅夫的成就得到了彻底的巩固。显然，

屠格涅夫已经踏上了自己真正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情被压迫的人民，描写奴役制度的罪恶，揭示农奴制的实质，暴露贵族这一保守势力，这正是后来《猎人笔记》的主旨。

作者在农村期间积累了大量素材，他准备用这些材料写成一本书。但是，他愈来愈深地感觉到：他只有到西方去，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必须远离我的敌人，这样可以从远处对它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我面前的这个敌人有明确的形象，它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它就是农奴制。我已搜集了它的全部罪孽，决心与它斗争到底。我发誓永不和它妥协……我之所以到西方去，就是要更好地实现这一誓言。”屠格涅夫确信，如果留在俄国，就完不成《猎人笔记》。当然，屠格涅夫出国的另一原因也是为了不愿意离开波丽娜·维亚尔多一家。

屠格涅夫出国后不久，1847年5月初，别林斯基到德国查尔茨布隆作矿泉治疗。屠格涅夫从柏林出发，前去迎接别林斯基。他们来到德累斯顿，波丽娜·维亚尔多正在这里演出。别林斯基对屠格涅夫如此恋慕波丽娜深感疑虑，并多次暗示屠格涅夫这是个冒失之举。

两人离开了德累斯顿，来到查尔茨布隆，在一条很不漂亮的街道上租了一幢整洁的二楼楼房住了下来。

屠格涅夫像儿子一样照顾别林斯基。其实他们在刚开始交往时，屠格涅夫就称呼别林斯基为“父亲和指挥官”，别林斯基把屠格涅夫叫作“孩子”，有时开玩笑叫他“亲爱的黄口孺子”。

别林斯基的健康状况很差，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医生对所有的问题，总是回答那句话：“是的，您的朋友病情很严重。”

屠格涅夫在查尔茨布隆无所事事，决定继续写作《猎人笔记》。别林斯基卧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就成了临时工作室，屠格涅夫开始专心致志地创作。

没过几天，他的新短篇《总管》完成。这是《猎人笔记》中社会意义最尖锐、反农奴制度倾向最鲜明有力的一篇小说。屠格涅夫把作品朗诵给别林斯基听，小说中有一处特别使他吃惊：地主宾诺奇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地下令鞭打仆人，仅仅是因为仆人端给他的酒没有加热过。

后来，列宁对屠格涅夫刻画的那个温文尔雅实质心狠手毒的农奴主形象评价道：“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他是那样地人道，竟不关心鞭挞费多尔的棒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他不声不响、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真像一个有教养的

温和慈祥的人。”

在《猎人笔记》的最初7个短篇里，别林斯基特别欣赏《霍尔和卡里内奇》和《总管》，这些短篇正是别林斯基的“难道农民不是人”这一提法的鲜明体现。别林斯基在他临终前所写的《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评价《猎人笔记》时说：“并不是他（指屠格涅夫）的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同样好。有的好一些，有的差一些，但没有一篇不是饶有兴趣、引人入胜、富有教育意义的，直到目前为止，《霍尔和卡里内奇》仍是所有猎人故事中最优秀的一篇，其次是《总管》，再次是《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和《事务所》。”

不久，屠格涅夫离开查尔茨布隆，去柏林看看朋友。别林斯基则去巴黎作进一步治疗。

屠格涅夫后来到了巴黎，成了别林斯基在巴黎的旅伴和向导。当时，屠格涅夫正在巴黎库塔甫涅尔的维亚尔多夫妇家作客。

9月底，别林斯基返回祖国。那一天屠格涅夫刚巧没来巴黎，只是从库塔甫涅尔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别林斯基，您要回俄国去了，我不能亲自送你，不能跟您说两句惜别的话，我总不愿意放你走……我正像您说的，虽然是个小孩子，而且轻率浮躁，但我却会爱惜好人，并且会很久很久地眷恋他们……”

1848年春，别林斯基溘然长逝。从此，屠格

涅夫再也没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再也没有这样的“父亲和指挥官”。

在波丽娜·维亚尔多巡回访问各个国家、各个城市之际，屠格涅夫总是独自一人住在库塔甫涅尔她的庄园里或在巴黎逗留，并不断给她写信，根据记忆冥想着她扮演的一个个角色，甚至一举一动都历历在目。

屠格涅夫对波丽娜·维亚尔多的爱慕已超出了普通爱情。他迷恋她那完美的天性，横溢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表演天才。他密切关注着她的发展。他阅读报刊上关于她演出的评论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其演技愈臻完善；他在信中向她分析歌剧主人公的形象，使波丽娜能更深刻地了解她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时也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她的表演天才；他为她在海外演出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鼓励她以自己的演技征服世界。

1847到1850年，屠格涅夫一直住在法国，除了短暂的比利时之行，什么地方也没去。这是他少有的多产的3年。文思泉涌，他自己曾这样比喻，他的文思就像不请自来的旅客，潮水一般地涌进这小镇上的旅店里，他这个店主急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安排他们。写作之余，他去闲游漫步，并考虑第二天写作的内容。

就这样，文思不断地涌着，屠格涅夫不断地创作

着，从巴黎经常往彼得堡《现代人》编辑部邮寄他的一份份成果。三年内，《现代人》上登载了21篇《猎人笔记》故事。在这些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中，作家用自己的爱和同情心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农民：聪明的霍尔、幻想家卡里内奇、勇敢的马克西姆、探求真理的卡西央……农奴制并未使他们丧失崇高的精神和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俄罗斯民族最美好的性格特点。《猎人笔记》是一部献给俄国农民的真诚的赞美诗。同时，这组文集通过对专横霸道、胡作非为的地主的描绘，揭露了农奴制的野蛮本质。赫尔岑把《猎人笔记》称为对农奴制度的起诉书。而且，《猎人笔记》以真实的笔调展示了俄罗斯美丽的自然风光，白净草原、察普雷森林、祖莎河、里果甫……一副副美丽而真实的画面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深刻了解。

《猎人笔记》中的每个短篇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把陆续刊登在《现代人》杂志的这些短篇收在一个集子里，它们将会更加有力，更吸引人。早在1847年夏天，屠格涅夫住在查尔茨布隆创作《总管》时，就画了一张《猎人笔记》未来版本的扉页画面。年底，涅克拉索夫也提议出版《猎人笔记》单行本。但直到1852年，这本优秀的著作才正式问世，又增加了一篇《两地主》。随后增加的三篇是

《且尔抚泼哈诺夫的末路》、《车轮在响》、《活尸》。这样，到1880年编辑屠格涅夫文集时，《猎人笔记》已经是由25个短篇组成。

俄国社会各界都把《猎人笔记》视为“解放农民的宣传”。当汇集成册出版了单行本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因为这是“一支整齐进攻的队伍，是一阵猛烈的炮火在反对地主生活方式”。

俄国伟大作家高尔基，童年时会如饥似渴地读过“异常优美的《猎人笔记》”。他后来回忆《猎人笔记》和其他俄罗斯作家的书时说：“这些书荡涤了我的灵魂，仿佛剥掉了我灵魂的一层皮，冲走了我对贫苦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是好书，我懂得了我对好书的需要。”

第六章 在法国

从1847到1850年屠格涅夫在法国居住的三年期间，除了《猎人笔记》，他还创作了大量剧本。

早在40年代初，屠格涅夫就尝试过戏剧创作，但这些剧本内容空泛，缺乏时代性、倾向性和独创精神。早期的剧本都取自外国的题材(如《斯节诺》剧情发生于意大利)，它们不是来自俄国生活，而后来在法国写的剧本，则描绘了俄罗斯外省贵族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

《食客》和《贵族长的早宴》是其中最优秀的喜剧，它们的主题与《猎人笔记》的主题是相同的。屠格涅夫对于草原地主的生活、风俗、恶习进行了幽默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

屠格涅夫的同时代人高度评价他的剧作才能。果戈理称赞《贵族长的早宴》中那个又呆板又好斗嘴的地主婆卡乌罗娃写得不错，赫尔岑则认为屠格涅夫的剧本，简直是一顿美餐。

屠格涅夫青年时期写浪漫主义的诗剧《斯节诺》，40年代末期创作具有现实意义的《食客》和《贵族长的早宴》，这是他深刻地领悟了果戈理和别林斯基

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之后，创作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有益的变化集中体现。

不过，屠格涅夫认为自己具有当剧作家的天赋的时间并不长。他的最后一部戏剧创作是心理描写细腻的剧本《村居一月》，后来的苏联著名戏剧家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用不同寻常的表演格调把它搬上了戏剧舞台。

创作之余，屠格涅夫在巴黎勤奋地学习西班牙语，开始阅读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的原文剧作，深入钻研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屠格涅夫后来从塞万提斯的小说里汲取了丰富的材料，写成了一篇长文章《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从此，塞万提斯的小说成为屠格涅夫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屠格涅夫在巴黎的日子里，亲眼目睹了法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

别林斯基回俄国后，赫尔岑于1847年春天来到巴黎。屠格涅夫与赫尔岑建立了密切关系。屠格涅夫成了赫尔岑家中的一员。在赫尔岑的小女儿重病期间，屠格涅夫深更半夜去药房抓药；有一次，屠格涅夫染上可怕的霍乱病，赫尔岑把妻子和孩子送往城外，自己留下来照顾屠格涅夫。

巴枯宁当时也在法国巴黎，但他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使当局下令他离开法国，于是他迁居比利时布

鲁塞尔。1848年初，屠格涅夫也到了布鲁塞尔，和老朋友见面，虽然他们的思想并不一致，但仍然是朋友。

就在布鲁塞尔，屠格涅夫听到了法国革命的消息。2月26日早晨，屠格涅夫还躺在旅馆的床上，没有睡着，突然听见有人高喊：“法国成立共和国啦！”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翻身下床，跑出房间，看见走廊里一个旅店茶房正逐间打开左右两旁的房门，高声喊叫着那句话。半小时后，屠格涅夫已穿戴好，收拾行李，坐火车到了巴黎。

屠格涅夫看到，巴黎城里到处都飘扬着象征共和国的三色旗，看到拆除街垒的武装工人，无产阶级实现了1848年革命。屠格涅夫感到异常激动。

然而法国大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果实，临时政府辜负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期望。终于到了法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可怕日子，屠格涅夫亲眼目睹了这场血的悲剧。6月23日早晨，屠格涅夫在街上走着，这里笼罩着一片暴风雨前的沉闷气氛，他看到了工人们在路中央筑起来的大小不等的高高的街垒。当一队刺刀闪闪发亮的国民卫队出现的时候，他正站在被起义者占领的茹温手套工厂的墙脚下。国民卫队把路占领后，便朝着街垒列成队形，于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开始了……

所有巴黎革命的悲剧景象，永远铭刻在屠格涅夫的心中。多年之后，他在文学和生活回忆录《戴灰眼镜的人》一文中曾谈到了这些情况。在长篇小说《罗亭》的尾声中也写了革命事件的悲惨结局中的一个插曲。

屠格涅夫在巴黎认识了作为政治侨民住在那里的德国革命诗人海尔维格，他们常常来往，互诉衷曲。就在六月的一天，发生了一件事，给屠格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正坐在海尔维格房间里，一个侍役领进来一个驼背的老工人，穿着短衫，两眼红肿，一脸深深的皱纹。他说，他是受革命工人的委派，特来通知他所不认识的海尔维格公民：海尔维格的那个从柏林来的儿子和他的保姆安全无恙，等危险结束，即可回家，让海尔维格放心。海尔维格对这位老人历尽千辛万苦、面临逮捕和死亡的危险、奋不顾身的举动大为震惊，要给他酬金，他坚决不接受，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说：“是我们的人民派我来的。”

这就是同革命者会见的情景。屠格涅夫受到了深深的震撼，通过这个“穿短衫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看到了真正英雄行为和真正人道主义的表现。他把这一情景写成了特写《我们的人民派我来的》，其中写道：“来找海尔维格的那位老人下落不明，但他的所作所为，他那几乎是不自觉的朴素的

真诚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惊讶。显然，他根本没想到过，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作了自我牺牲。同时，也不能不对那些派他来的人们表示敬佩，他们在紧张危急的决战时刻，还能想到一个陌生的‘有产者’心灵上的不安，让他放下心来。”

屠格涅夫在法国，广泛地涉猎研究欧洲的艺术，同时也积极推进了俄罗斯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他多次会见了在俄国文学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乔治·桑。乔治·桑对屠格涅夫这位写了许多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家很感兴趣，她对短篇小说《活尸》大加赞赏，并给屠格涅夫写信说：“我们大家都应当向您学习。”屠格涅夫还同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友好交往，当时梅里美正在学习俄语，以便阅读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原著。

1850年6月，屠格涅夫决定回俄国。临回俄国前，他写信给赫尔岑说：“你可以放心，你的信和文件，我会完整无缺地送到……”看来，屠格涅夫又干起了“外交信使”的差使，就像1841年离开柏林时替巴枯宁携带文件一样，现在又替赫尔岑捎文件了。因为他们的这些材料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交给沙皇邮局极不可靠，却可以毫无疑问地交给他们信赖的人——屠格涅夫。

第七章 流放

1850年6月底，屠格涅夫回到了莫斯科，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在那里等他。屠格涅夫和哥哥毕恭毕敬地请求母亲分给他们一点财产以维持独立的生活。瓦尔瓦拉模棱两可地答应作个安排，但一切毫无变化。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一意孤行，爱弄权势，她想用钱财控制住两个儿子，让他们永远俯首贴耳听她摆布。屠格涅夫想说服她至少是帮助下哥哥，因为哥哥正拖儿带女，忍饥挨饿，挣扎在贫穷线上。这场谈话引起了争吵，屠格涅夫失望地离开了家。

这次回国，屠格涅夫亲眼见到他和阿芙多吉娅的女儿8岁的波莉娜的屈辱可悲的处境。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把她寄养在一个农奴洗衣妇那里。这一切使屠格涅夫考虑到女儿今后的遭遇。于是，他给波丽娜·维亚尔多写信，大致谈了他同阿芙多吉娅·叶尔莫拉耶夫娜的恋爱经过，并提到了他们的女儿。波丽娜是理解屠格涅夫心情的，建议他把孩子放到她家去，和她的子女一起受教育。10月底，波莉娜被人带到了巴黎。屠格涅夫紧跟着写了封信给维亚尔多，说他

决心从现在起，凡是女儿的事都由他来作主。父女一别就是5年多，后来在巴黎见面时，女儿已不会讲俄语了。

屠格涅夫刚送女儿走，就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等他赶回家时，已是母亲的出殡日。瓦尔瓦拉活着的时候，带给儿子的只有痛苦，临终时还考虑着怎样才能使两个儿子破落，她让管家以低价把领地卖掉或者付之一炬。虽然母亲如此心狠，屠格涅夫觉得还是应该忘掉这一切。

兄弟之间分了家，屠格涅夫对哥哥作了极大的让步，他一定要把斯巴斯科耶留给哥哥。在屠格涅夫的地产上，他解放了家奴，愿意留下的农民改为代役交租制。他是想当一个开明地主，希望农民在他的庇护下，生活有所改善。

屠格涅夫心地善良，常因为自己充当地主这种角色而感到窘迫不安，甚至感到对不起农民，因此，总是尽量帮助他们。这已经是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事。有一次，屠格涅夫来到一个村庄打猎，按照地主通常的习惯，屠格涅夫走上台阶接见农民。有一个农民向他抱怨土地太少，屠格涅夫便吩咐给他增加土地，接着，在场的其他农民也要求增加，转眼间，屠格涅夫在这个村子里的全部土地就都变成农民的了。

屠格涅夫继承了财产后，不愿意也不善于经营，

常喜欢挑一些和蔼仁慈的人来当管家，但他们藏奸弄巧、中饱私囊，把领地弄得乱七八糟，损害了主人，也压榨了农奴。

屠格涅夫有大批农奴，并没有解放他的全部农民，他的想法是：与其让农民处于没有保障的地位，受贪得无厌的地方官管辖，不如让他们从属于一个开明地主更好一些。但是，农民生活的根本改善不可能是某些个人的善良、大公无私就能办到的。

屠格涅夫虽然是个地主，他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中也不能不使用农奴制的权力，但作为作家，屠格涅夫始终是一位用文学作为武器反对农奴制的最真诚、最顽强和最彻底的战士。

屠格涅夫回到俄国还不到两年，就被逮捕和流放，原因与果戈理之死和《猎人笔记》的问世紧密相联。

果戈理是俄国的伟大作家，他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屠格涅夫十分钦佩果戈理的天才，几乎能背熟他的作品。30年代在彼得堡大学的讲坛上，40年代初在莫斯科一个朋友家里，屠格涅夫曾经见过果戈理，只有到了现在，他才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正式和敬爱的作家结识。

屠格涅夫曾这样描述，他和果戈理见面的情景：“果戈理讲了许多话，很活跃……语言流畅，条理清楚，而又韵味无穷。他最初留给我的那种疲惫不堪、

焦躁不安的印象消失了，他谈到文学、作家的使命，谈到如何对待自己的作品……他像‘名家’那样，事先并没做什么准备。”

果戈理对屠格涅夫发生兴趣，是从他发表《猎人笔记》的最初几个短篇开始的。他称屠格涅夫为天才，并鼓励他珍惜自己的天才，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好好构思，不要厌烦修改。

过了几天，果戈理在一次聚会中，给大家朗读他的剧本《钦差大臣》，朴实而又含蓄的风格，浑厚深沉的感情使屠格涅夫惊叹不止，称赞说：“这不啻是过节和出席宴会。”

1852年2月，屠格涅夫听到果戈理逝世的噩耗，万分震惊。他写给波丽娜·维亚尔多说：“此时此刻，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心不痛苦万分。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是一位作家，他让我们认识了自己。对于我们来说，他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二个彼得大帝……”

屠格涅夫曾向朋友承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记事时起，没有什么事情比果戈理的逝世，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怀着这种极度悲痛的心情，屠格涅夫写了悼念文章。文章说：“果戈理逝世了！哪个俄罗斯人的心灵不被这句话所震动？他死了，我们的损失如此惨

重……是的，他死了，我们现在有权利（他的逝世给了我们这种痛苦的权利）称他为伟大的人物，他以他的名字标志着我们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我们为他而感到自豪，他是我们的光荣！”

但是，沙皇尼古拉政府害怕果戈理逝世可能引起的反应，禁止发表有关果戈理的文章，并说果戈理是个奴才作家。屠格涅夫的悼念文章被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查禁，不准在报上发表。

于是屠格涅夫把文章寄给了莫斯科的朋友，请他们帮忙发表。莫斯科书刊检查机关总算准予发表，悼念文章刊登在1852年5月16日的《莫斯科新闻》上。

文章一发表，灾难也就降临了。沙皇以不听从和违反书刊审查条例为由，下令把屠格涅夫拘留一个月，然后流放到斯巴斯科耶。

其实，政府迫害屠格涅夫除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这一点屠格涅夫本人早已认识到：“他们是想禁止由于果戈理之死而引起的一切言论，同时也禁止我的一切文学活动，这样做他们才会高兴。”《猎人笔记》“是对地主的日常生活的一系列进攻，是一排排炮火”，极大地激怒了统治阶层。正是由于它们，屠格涅夫才遭到了逮捕和流放。

1862年4月16日，屠格涅夫被关进了拘留

所。就在这里，他写下了中篇小说《木木》。小说的主人公是以屠格涅夫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为原型，小说中的哑巴和小狗木木也是取材于真实生活。这篇小说以其平静而又凄凉的叙述口吻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感人的印象。《木木》是屠格涅夫继《猎人笔记》后反农奴制的继续。他就是这样，以更尖锐更深刻地揭露农奴制的罪恶来回答沙皇政府对他的惩处。

6月初，屠格涅夫来到了斯巴斯科耶。被流放的作家在农村度过了一年半时光。

他首先钻进书堆里。斯巴斯科耶的图书馆里藏有5000多册书，从祖辈们开始搜集书籍，屠格涅夫又添置了许多俄文和外国新书，包括别林斯基珍藏着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全套俄国杂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书籍，还有许多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屠格涅夫读遍了果戈理的所有著作，然后读俄国史、俄罗斯叙事诗，研究俄罗斯的神话、传说、歌曲，以便深入了解本国人民的民族性格、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特点。

1852年夏天，《猎人笔记》单行本问世。和与之几乎同时出版的谢·季·阿克萨柯夫的《奥连堡省带枪猎人的笔记》相比较，前者只是在字面上与打猎有关，有几篇对打猎只字未提，其他几篇只有两三

个词、两三句话是作者用来作开场白的：“我打猎回来”，“我们出发去打山鹑”等。只有一篇特写《树林和草原》是完全写打猎的。而后者的内容是严格符合题目的规定的，才是真正的猎人的笔记。

屠格涅夫是带着《奥连堡省带枪猎人的笔记》这本书来到乡下的。他准备为《现代人》杂志写一篇评论文章。他赞扬这本书的作者对大自然的观察是何等细致，对它的理解和爱是何等深沉，而且是真正的俄罗斯语言，灵活巧妙，直率真挚，笔法流畅，清新优雅。

《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以后，屠格涅夫觉得自己应该换条路走，寻找新的手法。他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能力去写平静含蓄的大东西，能否找到简单清晰的思路！”屠格涅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鲍特金曾劝屠格涅夫多用短篇小说这种已取得成功的形式来写农村生活。但屠格涅夫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不能走回头路。

在乡下的日子里，屠格涅夫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如：诗人费特，他们两人都喜爱诗歌和用枪打猎。卡拉捷耶夫，一个酷爱音乐和文学，有独特的幽默与直率的非常热情的人。

屠格涅夫一直在思念着遥远的波丽娜·维亚尔多，在孤独的流放日子里，他给她写信说：“亲爱的友好，

我恳求您常给我来信……我现在被困在乡下，不知要多长时间……听不到音乐，看不到朋友——有什么可说的！甚至连能够在一起消磨时间的邻居都没有。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只有工作和回忆。但要使工作时心情轻松愉快，回忆时不很伤心，我就需要您的信，需要回响着您那幸福紧张生活的余音，散发着阳光和诗的芳香的信。”

不久，波丽娜·维亚尔多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巡回演出。屠格涅夫不顾禁止他入京城的规定，拿着别人的身份证，于1853年3月下旬秘密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在那里度过了10天，为维亚尔多助阵，沉浸在她美妙的天才表演中。4月中旬，他在信中给她写道：“您要知道，我献给您的那种情谊，只能同我的生命一起结束。”

在孤独的乡下生活中，屠格涅夫愈来愈埋头写作。短短的时间里，他写出了《客栈》、《两朋友》两个中篇，以及长篇《两代人》的第一部。

这部长篇正是屠格涅夫“应该换条路走了”的第一次尝试，但并不很成功，发表的只是其中的一章，题为《地主私人事务所》。但是，《两代人》却是作者后来响遍全俄罗斯的作品《父与子》的先声。此后，屠格涅夫执着地向着“长篇”奋斗，他的一部部长篇小说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在体裁上发生变化，从短篇走向长篇，而且作品的题材也发生了变化。他的朋友对他放弃《猎人笔记》的写法表示赞同，但认为作家必须深入钻研农民题材，创造出雄健的农民形象。但屠格涅夫这时已经决心不再写农民题材，他深知自己对农民生活缺乏深入了解，也不可能更广泛深刻地描述农奴制度的丑恶现象，也就不可能对俄罗斯农民作全面实际的描写。

屠格涅夫所选择的第一部长篇的主人公就是社会上“文明阶层”的人物。他后来的杰出长篇《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都是以“文明阶层”为描写对象，体现出文明阶层的俄国人瞬息变幻的面貌。

第八章 培植文学新芽

1853年11月23日，屠格涅夫收到了流放期已满的通知书，允许他进入都城。

当天，屠格涅夫就把庄园交给一个叔叔来管理，自己随即启程到彼得堡。

12月13日，《现代人》编辑部和文学家们为德高望重的《猎人笔记》的作者举行盛大午宴，庆祝他获得自由。午宴上人们兴高采烈地祝酒、讲话、赋诗。

屠格涅夫从乡下回到首都后，同涅克拉索夫、格里戈罗维齐、巴纳耶夫、安年科夫、鲍特金等文学界朋友频繁来往，还有费特——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结识的朋友。费特几乎每天都来看他。

一天，屠格涅夫来到费特居住的旅馆，看到他写的诗《春讯时节的德聂伯河上》，给予肯定，并鼓励他在诗歌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同屠格涅夫的友谊在费特的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屠格涅夫把他介绍进《现代人》杂志，并耐心为他修改诗作，提高他作诗的技巧，还花费大量精力为他发排第三本诗集。

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十分关心新生的文学力量。如今他本人已是德高望重，文学威望日日提高。他从伟大朋友别林斯基那里继承下来这种爱惜文学新生幼芽的态度，尽力提携文学新秀。

1854年夏天，屠格涅夫爱上了一个远亲的女儿奥尔迦·亚历山德罗夫娜·屠格涅娃。她仅18岁，善良聪明，讨人喜欢，有音乐天赋。屠格涅夫曾打算向她求婚，但后来，这些想法都成为泡影。看来，屠格涅夫还是忘不了波丽娜·维亚尔多，他对她那种缠绵深厚的眷恋之情，仍然超过了对奥尔迦·屠格涅娃的爱情。据说，屠格涅夫在长篇《烟》中所描写的里维诺夫的未婚妻塔吉亚娜·彼得罗夫娜就是奥尔迦·亚历山德罗夫娜。

从1853年中期起，俄国同土耳其的军队冲突加剧，结果就与欧洲列强发生了战争。1854年夏天，英国舰队开进了波罗的海——同英法的战争爆发了。

一个月之后，巴黎出版了《猎人笔记》的第一种译本，书名改为《一个俄国贵族老爷的回忆录，即俄国农村贵族和农民的现状图》。

起初，法国的资产阶级办报人出版他的作品，只是想将它作为揭露俄国这个发狂到和英法联军作战的野蛮国家里所发生的悲惨景象和证明这个国家由于贵

族为非作歹，农民怨声载道而局势不稳的文件。但后来，人们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发现了虽然粗野，但充满道德力量和天赋才智的俄罗斯人的民族特色，看到了农奴制的残酷肆虐，也看到了农奴获得解放的可能。因此，这本书对英法来说，不但没有利于对俄战役，反而让人热爱这个国家。因此，有人说：“屠格涅夫用这本书报效了自己的祖国。”

1854年7月，法国著名作家普罗斯贝尔·梅里美在法国《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为《猎人笔记》写的《文学与俄国的农奴制》一文，对该书作了详尽而全面的评价。梅里美认为《猎人笔记》写作手法高超，描写极其细致，使人对俄国社会状况产生了极为确切的概念，并对屠格涅夫寄予厚望。

屠格涅夫的声誉就这样在欧洲传开了。文学界将他看作是果戈理的继承者，是当代最有天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屠格涅夫一直在关心《现代人》杂志，不但自己投稿，还经常分析研究杂志的内容，提出希望和建议，关心杂志的声誉。

屠格涅夫同《现代人》的主办者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涅克拉索夫同屠格涅夫见面时，总要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他听；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诗人便把诗寄给屠格涅夫，让他提提意见，

对他极其信任。屠格涅夫对涅克拉索夫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他有一些诗跟“普希金的诗一样优美”。1856年出版了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屠格涅夫参加了编辑工作。

1854年秋，涅克拉索夫因为喉疾而逐渐失声，变得抑郁寡欢。屠格涅夫劝他一起去斯巴斯科耶休养。两人每天一早，就带着食品和火药从斯巴斯科耶出发去打猎。有一天打猎时，涅克拉索夫用嘶哑的声音艰难地向屠格涅夫朗诵了一部诗体小说的开头部分，即后来的长诗《萨莎》的序曲。一年半后，这部作品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并注明是献给伊·屠的（即屠格涅夫）。

此间，屠格涅夫在流放时结交的好友卡拉捷耶夫常常来斯巴斯科耶。每到晚上，他们三人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战事，战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

不久，卡拉捷耶夫被选为奥廖尔省义勇军的军官，要去克里米亚。临走前，他去找屠格涅夫，留下一个本子，说他相信自己会死在克里米亚，想请屠格涅夫根据这个本子上的故事写点什么。卡拉捷耶夫的预感应验了，他在营地上染了斑疹而去世。几年之后，屠格涅夫把已故青年友人遗作中写得并不成功的自传体真实故事作了长篇《前夜》的基础。

涅克拉索夫与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商量《现代

人》的事务时，经常提到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中篇《童年》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当时他用的署名是“列·尼”。其实，早在1852年屠格涅夫流放斯巴斯科耶时，就对这篇文章和作者很感兴趣，但还不知道作者的名字。当时，他同托尔斯泰的妹妹有很深的友谊，曾把这部作品读给她听，她听后感到很惊奇，因为小说中描写的某些故事，竟是自己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实事。屠格涅夫还说如果这个青年作者一直这样写下去，那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的赞扬引以为荣。他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觉得继屠格涅夫这样的文学大师之后，要创造出点新东西，是何等困难。他打算把自己的一部中篇《伐木》献给屠格涅夫，这篇作品很多地方与《猎人笔记》相类似。

这时，《现代人》发表了托尔斯泰的另一部中篇《少年》。这部作品以其独特风格和诗情画意赢得了文学家们的一致赞扬。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的妹妹信中说：“《少年》在这里产生了深刻影响，所有的人都认为，托尔斯泰已经成为我国优秀作家队伍中的人，——现在，只要他再写出这样的作品，就会理所当然地荣居首位，头把交椅在等待着他。”

在对待年轻的托尔斯泰的态度上，这位公认的文学大师突出地表现了谦虚精神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

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就应验了。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坐上了俄罗斯文学的头把交椅，在世界文坛上也首屈一指。他的辉煌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成为不朽的世界经典名著。

1855年，远方的塞瓦斯托波尔正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英勇战斗。在塞瓦斯托波尔部队上的托尔斯泰给《现代人》寄来了通讯《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使俄罗斯人民充满了信心。屠格涅夫则为这些文章高呼“万岁”，甚至为托尔斯泰的健康干了一杯香槟酒。

2月18日，尼古拉一世突然死亡。俄国社会各阶层欢欣鼓舞，解放运动的新高潮开始。以前严格的书刊检查限制，已大大放松了。

1855年，著名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了《现代人》编辑部的一个领导职务。他着手研究广大读者深为关切的重要问题，坚持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的原则。

在《现代人》杂志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倾向：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宣传农民革命的革命民主主义派，一种是在企图“从上而下”依靠政府和贵族的力量废除农奴制的自由主义贵族派。屠格涅夫是站在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他反对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的革命道路，只寄希望于农奴制自上而下地被废除。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相比，他的政治观点是

落后的。这正是坚决反对农奴制度的屠格涅夫的思想局限性。

第九章 开辟创作新路——《罗亭》

屠格涅夫始终没有放弃写长篇的念头，他一直希望用一部作品来深刻揭示时代的根本问题。1855年春夏两季，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创作了献给40年代的人们的长篇小说《罗亭》。

作家在此之前创作了一系列描写贵族理想主义者、失败者的短篇小说，如《一个多余人的日记》、《通信》、《两个朋友》、《雅科夫·巴申拉夫》，为《罗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罗亭》的问世标志着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罗亭》反映了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探索。罗亭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他受过广泛的良好教育，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他关心社会的重大问题，信仰科学，渴望真理，渴望自由。小说写他热忱地宣传真理和理想，以出色的口才、热烈的激情感染周围的人们，“词句是左右逢源地、自由自在地流到嘴边，每一个字都好像径直从他灵魂深处喷涌出来，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他启迪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为他的崇高思想所吸引，唤

起对美好生活的爱。17岁的少女娜达丽亚·拉松斯卡雅就是在他的启蒙下觉醒，情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她同时也爱上了罗亭。不过罗亭又有致命的弱点：脱离实际，意志软弱，缺乏实践的能力，理想只能流于空谈，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罗亭的根本意愿是和农奴制的统治势不两立的，但他不知道怎样去实现自己的思想。他有绝顶聪明的天赋、过人的才智、渊博的知识、满腔的热情，但却不会正确运用它们，不会进行斗争，结果一事无成。这是个“多余人”的新典型。所谓“多余人”是指俄国上层社会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不愿与贵族社会同流合污，同时又脱离人民，永远不能够站在人民方面，只能作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在小说中，作者肯定了罗亭宣传理想，起了进步作用，但在40年代需要的是行动，而他不能实践就显出局限性了。作者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表示惋惜。罗亭这种人物是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罗亭式人物的不幸在于他们脱离了饥寒交迫、被奴役的人民。但是，他们还是起了积极作用。高尔基的分析比较中肯：“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智慧贫乏，以及农民大众之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一个理想家

——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是所谓开拓处女地的人；可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实践家能够干出什么呢？”

罗亭身上体现了屠格涅夫青年时代的朋友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特征。屠格涅夫在与巴枯宁相处的几年间，既熟悉了他天性中刚强的方面，也了解了他的不良之处。“我在罗亭身上相当忠实地表现了他的影子。”屠格涅夫后来说。但是，罗亭并不就是巴枯宁，屠格涅夫把当时某些其他人物的特征赋予了这一形象，因此它就具有了典型性。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因为……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他们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优秀的遗产。”

屠格涅夫在这篇小说创作中，严格遵守现实主义原则。他把小说看成是描写生活的艺术，创作从生活出发：“我一向不能凭空创作，如果我要写出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就非要找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他仿佛就是给我作一条主要线索的。”屠格涅夫从生活中积累素材，进行创造性的加工。他不是把原型人物进行翻版，而是无拘无束、大胆地采用某些成分来创造新的形象。也就是说，不单是真事，而是艺术的真实。屠格涅夫认为艺术创作真实性的最终结果就是典型化。因此，他笔下的罗亭和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一起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典型形象。

《罗亭》这部长篇是他长时间酝酿构思的成果，但写的时间非常短，只花了7个星期，他对这部小说很满意，对自己过去的任何一部作品，从来也没有像对《罗亭》那样钟爱过。1856年，《现代人》第一、二期刊登了这部长篇，反响热烈。大家一致认为，《罗亭》是屠格涅夫在创作中迈出的新的而且是重要的一步。

1855年11月末，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的战场回到彼得堡，住在屠格涅夫家里。屠格涅夫很欣赏托尔斯泰，在朋友面前夸他是个讨人喜欢、最具独创精神的出色的人。屠格涅夫就像慈父一样爱着托尔斯泰。

两人在一起，参加文学晚会，去象棋俱乐部吃饭、看戏，或参加业余爱好者音乐会。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引进了彼得堡的文学界和新闻界，介绍他认识了很多作家，并帮助他熟悉当时俄罗斯文坛上的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屠格涅夫把他个人生活中所爱戴和敬仰的一切都介绍给托尔斯泰。在他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别林斯基的论文，而以前他是完全不把它们

放在眼里的。屠格涅夫把斯坦凯维奇的书信集寄给了托尔斯泰，年轻的托尔斯泰对斯坦凯维奇发生了浓厚兴趣，对其评价很高。又是在屠格涅夫的帮助下，托尔斯泰对赫尔岑的创作和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此可见，同屠格涅夫的友谊是年轻的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但是，两人年龄的差异、天性的迥然不同和观点的对立影响了两人建立赤诚相见的关系。托尔斯泰生性执拗、坦率直爽，提问题毫不折衷，一句话就能伤透别人的心。而屠格涅夫态度温和谦逊，跟多数人都能和睦相处，但同托尔斯泰争论起来，也常常大发雷霆，气喘吁吁，声音变得又尖又细。

在政治思想上，屠格涅夫是站在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上。托尔斯泰回避政治，他反对革命民主思想，也厌恶自由主义的温和与胆怯，讨厌自由主义者那些华而不实的词藻。因此两人之间就发生了误会和争吵，有时是短暂轻微的，有时则经久难消。

但是，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争吵和冲突，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终止。屠格涅夫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外国，都坚定地宣传托尔斯泰的作品，并甘愿承认这位新秀的领先地位，认为俄罗斯文学的第一把交椅应当属于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则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我记得我在文学上的名望全靠您的栽培，我

还记得，您多么爱我的作品和个人。关于我，您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回忆，因为有一个时期我是真诚地爱过您的。”

两个伟大俄罗斯作家的友谊是坎坷、复杂的，但却在年复一年地巩固起来。

《罗亭》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争议。

《祖国纪事》的评论家杜迪什金认为罗亭不是新的典型形象，而是俄罗斯文学以前的“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的翻版。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文章表示不同看法，说罗亭同奥涅金、毕巧林是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彼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高度评价罗亭是一个完全忘了自己，全身心都奉献在公共利益上的热心人物。

涅克拉索夫在评论中，揭示了这部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并评价罗亭这个人物，“虽然有许多弱点，但却茁壮有力；虽然有许多缺陷，但却令人神往”。他相信屠格涅夫“开始了一个新的活动时期，他的天才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会给我们写出一些好作品来的，它们将被公众认为是果戈理之后我们新文学中首屈一指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作品”。

《罗亭》为屠格涅夫后来一系列优秀的小说打下了基础。从此，屠格涅夫开始了一条不同于《猎人笔

记》的崭新的创作道路，并逐步走向高峰。

1856年，《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共分三卷出版。这个内容丰富的文集，对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总结，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在俄罗斯文学生活中，也是一件大事。

第十章 爱的痛苦

屠格涅夫在提出申请出国护照之后，于1856年5月初去斯巴斯科耶，并到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家作客。屠格涅夫从一认识她起，就对她怀有深挚的好感。

就在这年夏天，屠格涅夫写了一个短篇《浮士德》。小说有着与玛·尼·托尔斯泰娅相识之情的影子。小说女主人公维拉·叶尔佐娃身上体现出她的某些特点。作品洋溢着深沉的、“令人心醉的，散发着芳香”的抒情气氛。

一年以后，屠格涅夫回忆写作这个短篇的情况时说：“《浮士德》是在生活发生转折的时候写的。我的整个心灵迸发出了回忆、希望、青春的最后几颗火花……”

1856年7月，屠格涅夫出国。他深深地眷恋着波丽娜·维亚尔多，这难以熄灭的爱情之火吸引着他去法国，并且他也渴望着与他寄居在维亚尔多家里的女儿团聚。

他事先没有把要来巴黎的事告诉女儿。他径直来到阿兰格女子寄宿中学，波丽娜在这里上学。当他走

进房间时，波莉娜正在弹钢琴。她一听到脚步声便马上回过头来，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父女一别就是五年，久别之后重逢该是多么快乐激动啊！五年间女儿大变样了，已经长得亭亭玉立。

9月，屠格涅夫到了伦敦，探望多年未见的赫尔岑。两人沉醉于谈话中，屠格涅夫向赫尔岑介绍了俄国的生活和他们共同的朋友们的情况。他们谈论着东西方的前途，争论着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他们都清楚地看到农民解放是不可避免的。

9月8日，屠格涅夫从伦敦动身去巴黎，又到库塔甫涅尔维亚尔多家暂住。他在这个环境里感到幸福和满足。屠格涅夫听到女儿在家庭演出中声情并茂地朗诵拉辛的悲剧《伊菲格尼》或是莫里哀的喜剧《愤世者》时，他这个做父亲的高兴得心花怒放。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女儿把祖国语言忘得干干净净了。

波丽娜·维亚尔多弹奏的贝多芬、莫扎特的奏鸣曲，常常使屠格涅夫沉醉于无尽遐思。

每到晚上，宾主围桌而坐，玩“画像”的游戏。常常是屠格涅夫画几幅侧面像，参加游戏的人给画像作分析说明。

虽然库塔甫涅尔的野生动物很少，总是山鹑和野兔，屠格涅夫还是不忘自己的老兴趣，有时试着打猎玩。

屠格涅夫告诉朋友们说在库塔甫涅尔度过的秋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这段时间，他还读了赫尔岑著名的《往事与随想》的开头几章，并鼓励支持他继续写下去，把“伟大富饶而且幅员广大”的俄罗斯国家“许多彼此格格不入的东西都容纳进去”。

这年冬天，屠格涅夫带着女儿迁到巴黎住，给他找了个英国女人作家庭教师。他则动手写另一部长篇《贵族之家》。差不多与《罗亭》发表的同时，屠格涅夫就在构思这部作品，考虑它的布局和细节。

屠格涅夫身在国外，心仍然牵挂着《现代人》，他不断给杂志写稿，报道西方文学新著，并选新作进行翻译。他还劝说托尔斯泰不要把杂志丢下不管。

然而，很快就有一件事影响了他的情绪，妨碍他计划的写作进程。一是他患了神经痛的毛病，那一年法国的冬季特别寒冷，使他的病情加重。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屠格涅夫和波丽娜·维亚尔多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些阴影。这两件事使他心灰意懒，心神不安，不能静下心来写作。

于是，屠格涅夫寄往祖国的每一封信都流露出对俄国的无限思念。他曾给朋友写信说：“在法国的居留使我觉得很平常。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使我和俄罗斯贴得更紧，更亲了；祖国的一切我倍感珍贵。”

屠格涅夫在巴黎的时候，有很多出国的朋友和同

胞来看望他，这多少减轻了他的寂寞苦恼，冲淡了他对祖国的强烈思念。

1857年1月，涅克拉索夫来到巴黎，屠格涅夫陪着他四处游逛，整天形影不离。两人彼此披肝沥胆，互诉衷肠，感情更深了。

不久，托尔斯泰也来到了巴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关系一直不能正常。两人在一起，总要争吵、动气，发生摩擦；一旦分开，两人又尽力寻找碰头的机会，希望重归于好。

现在，屠格涅夫又充当了托尔斯泰的向导，他们共同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和绘画展览，访问音乐院，看歌剧看戏。两人还经常谈起艺术创作，交流彼此的经验。

3月初，他们来到巴黎东南的城市第戎。托尔斯泰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写他的中篇《阿尔伯特》。屠格涅夫心情不好，不能安下心来写长篇《贵族之家》，只是抽空写写论文《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与特写《波列西耶纪行》。

看来，屠格涅夫和波丽娜·维亚尔多的私交中发生的波折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心绪，他烦恼、苦闷、沮丧，对自己的创作精力没有信心。他向朋友们抱怨自己的缭乱心情，想把一切甚至连文学活动都抛弃掉：“我永远不会不爱诗歌，因为这是我的生命，但当我

想到我今后再提笔写诗，又感到吃惊。现在，这一切都远远离开我了……”

托尔斯泰在巴黎住了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清楚地感觉到，屠格涅夫在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痛苦——一方面是感情的阴影，另一方面病魔缠身。托尔斯泰曾写信告诉朋友：“他(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人不幸的关系以及他的女儿，使他呆在这气候不利于他健康的地方，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从来没想到他能这样爱一个人。”

为了忘却苦恼，减轻病情，恢复内心的平静，在回国前的一年中，屠格涅夫游遍了欧洲的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可以说，这一年是他一生中到的地方最多的一年。

1817年夏，屠格涅夫在医生的劝告下，来到莱茵河畔离波恩不远的德国小镇辛茨格矿泉区治疗。屠格涅夫决心在那里边治疗边写作。

近一年没写东西，提起笔来很不习惯，慢慢地又恢复了他以前文思泉涌的写作状态。就在这里，屠格涅夫完成了中篇《阿霞》。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作品主人公爱上了一位非常热情而勇敢的姑娘阿霞，她心灵纯洁，率真自然。阿霞接受了他的爱情，但当阿霞期待他发表决定性意见时，他却茫然失措，像罗亭一样，害怕而退却。

这部小说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作品中展示了辛茨格这座古老的德国小城浪漫的轻烟薄雾，朦胧迷人的月光之夜，格调很动人，并带有某种深沉而强烈的伤感情绪。这正是屠格涅夫愁闷忧郁心境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

1857年10月，屠格涅夫和朋友鲍特金来到罗马。盛开的玫瑰、葱绿的橡树、明媚的秋色，使屠格涅夫的心情开始好转，内心的不安慢慢消失。他从罗马写信说：“这里，天空和大地天天都有某种节日的气氛。每天早晨，我刚醒来，那蔚蓝色的光辉已在窗口朝我微笑。”“在这片天空下，就连荒凉也显得优美、妩媚。在这里你才懂得‘我的悲哀是明媚的’这句诗的含意。”

屠格涅夫又像年轻时那样，在这美丽城市的街头漫步，参观博物馆、庙堂、宫殿、梵蒂冈的大厅、著名的郊外别墅。

就在罗马，屠格涅夫结识了俄国著名画家亚历山大·伊凡诺夫，他是名画《耶稣显容》的作者。屠格涅夫在给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信中谈到伊凡诺夫的画，说它是伟大崇高的艺术作品。

12月，屠格涅夫把《阿霞》寄给了《现代人》编辑部，小说受到大家的特别欢迎。涅克拉索夫说小说“散发着真诚的青春气息，整部小说才气横溢，犹

如一块纯金。整个优美的环境同它富有诗意的情节都非常协调，一点也不勉强；无论从美或是纯的角度去看，都是我们的空前之作”。

第十一章 《贵族之家》

1858年6月，屠格涅夫回到了祖国，在他出国的两年内，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了明显而重大的发展。早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专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就呈现出明显的解体迹象，现在，农奴解放问题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它的实现可能有两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由农奴主制订解放政策并获得自由派支持，以保留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条是人民进行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并推翻沙皇政权。这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

在《现代人》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盟中又加入了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谢甫琴科等，他们经常不断地为杂志撰稿。

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盟友的革命的思想方式是贵族作家决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的对立导致了后来文学界力量的最后划分。

屠格涅夫和安年科夫等为杂志撰稿的持自由派观点的作家，指责涅克拉索夫重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不过，自由派作家尽管反对车尔尼雪夫斯

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政治观点，但对他们的巨大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以及渊博的知识又不得不承认。

不久，屠格涅夫离开彼得堡去斯巴斯科耶，准备完成他的《贵族之家》。虽然小说的情节、结构都已考虑成熟，但在国外，由于心绪不宁，写作进行得很困难。到了斯巴斯科耶，屠格涅夫充满信心地投入到写作中，计划在初冬完成这部作品。

《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是一个贵族拉夫列茨基，他的生活很不正常，起初接受过荒唐的教育，结婚后，妻子凶狠、愚蠢而又道德败坏，婚姻的失败使拉夫列茨基被迫过着无聊的贵族生活。妻子侨居国外多年，讹传已去世；后来拉夫列茨基爱上了远房外甥女丽莎·卡里舍娜，一个严肃而善良的姑娘。然而不久之后他妻子突然归来，他和丽莎接受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决然分手。丽莎遁入修道院。

拉夫列茨基也是个“多余人”的典型，尽管他比罗亭前进了一步，力图克服言论与行动之间的脱节，比较重视务实，力求在自己庄园里改善农民的生活，愿意接近人民，但在他身上仍有严重不足：贵族习气和懒惰无为的作风，结果只能向命运屈服。不过，拉夫列茨基的悲剧和罗亭不同，罗亭是在从事社会实践和同环境作斗争中遭到失败，拉夫列茨基是在意识到个人幸福与社会道德观念相矛盾时不得不将它放弃，

拉夫列茨基同丽莎不能幸福结合，是因为他已经结婚，国家法律和教会戒律成了他们的障碍。

两个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和丽莎都是贵族社会道德和习俗的牺牲品。丽莎生长在俄罗斯一个偏僻角落里，未受过上流社会繁琐礼节教育的束缚，在老年保姆的影响下，笃信宗教。她真诚朴实，热情坦率，在周围生活中找不到寄托，于是心灵上便产生了一种对宗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当意识到对有妇之夫的拉夫列茨基的爱是一种“罪孽”，就离开自己的家到修道院隐居了。

《贵族之家》女主人公的悲剧形象，给俄国文学留下了一个俄罗斯少女道德纯洁和精神高尚的表征。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第一个在《贵族之家》里提出了宗教对婚姻的羁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尖锐的问题。

屠格涅夫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强调从生活出发，“我的一切像样的东西，都是生活赋予的……”《贵族之家》里有鲜明的自传体色彩。拉夫列茨基那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小村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就是作者经常去打猎的自己的小村庄托普基。1858年夏，屠格涅夫曾和诗人费特在这里打过沼泽地上的野物。这座村庄里看守破旧的老爷大院的老仆人，就是小说中以热情关切的口吻谈到的那位老仆人安东，并保留了

他的真实姓名，仍旧穿着灰色外套，戴着自己编织的白色手套。

屠格涅夫认为，典型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巧妙而完满地抓住某一类型人物所具的共同特点。屠格涅夫在塑造这样一个典型形象时，总要有一个“原型”，在此基础上逐渐把“合适的成分掺杂进去，粘附在他身上”。因此，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主人公——罗亭、巴扎洛夫、涅日达诺夫都不是以某一形象为直接和唯一的原型，而是融合了各个不同的“模特儿”身上的特点，如巴枯宁、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

拉夫列茨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典型性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综合了一些自传性的情节和屠格涅夫同时代人的一些特点。“原型”则是屠格涅夫的朋友著名诗人尼·普·奥加辽夫。

《贵族之家》构思的完成以至动笔写作是在屠格涅夫经常和奥加辽夫会面的时候。奥加辽夫的生活经历经过屠格涅夫的艺术加工，就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情节。

小说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有着和奥加辽夫相似的外貌特征，而且有着相近的性格品质：喜爱观摩，心地纯洁，潇洒自然，沉着稳健。

《贵族之家》从12到16章所写的故事，很像

奥加辽夫和玛丽亚·利沃夫娜·罗斯拉夫列娃的不幸婚姻。拉夫列茨基的婚姻失败是由于未婚妻的父母看中了他的财产而使用了各种圈套，奥加辽夫的新娘是奔萨省长的一个穷亲戚，她千方百计要让他这个侄女嫁一个有钱的新郎。奥加辽夫是在国外和妻子离异的，拉夫列茨基也是在国外同华尔华兹·巴弗罗夫娜破裂的。甚至两人给妻子的赡养费的数目也差不多。

奥加辽夫后来爱上了俄国将军屠契科夫的女儿娜塔丽亚，这与拉夫列茨基同丽莎的爱情相似。不同的是，生活中奥加辽夫的妻子已经死了，人们以为她还活着，奥加辽夫甚至托人提出起诉跟她离婚；小说里拉夫列茨基的妻子没有死，但是人家以为她死了。因此，结局也就完全不同。奥加辽夫和娜塔丽亚幸福结合，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则成了悲剧。

《贵族之家》表现出来的是作者的感受，是他的爱和憎，是他的幻想和失望。他在创作《贵族之家》时写的书信中，常常谈到他无处安身，孤单一人，命里注定漂泊无依：“我因为还没有品尝过全部幸福，又没有给自己安上一个舒适的窝，所以就在痛苦中渐渐衰老了。我的心还年轻，却已郁郁不欢而破碎……现在这一切都变了……我对这一切已不再抱任何指望，一切都已平息，坎坷已经消失，内心的责难已经沉寂——吹炉灰干什么？死灰是不会复燃的了……”这正

是《贵族之家》的主人公在个人幸福之梦破灭时的悲观心情。

第十二章 阴影

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写完《贵族之家》以后，写信给当时已经迁居到莫斯科去过冬的诗人费特，说他准备去莫斯科。

1856年11月5日，费特一家还没喝完咖啡，门口就响起了熟悉的车马声，屠格涅夫从台阶上走进来，费特一家高兴地欢迎他。费特把书房腾给屠格涅夫。当费特隔了一会儿进书房看他时，简直认不出自己的书桌了。“这样乱七八糟的，您怎么工作？”屠格涅夫说，一面井井有条地收拾着和折叠着文稿纸张、书籍，甚至连文具也收拾好了。

屠格涅夫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此间，莫斯科知识界差不多没有不来访问他的。《俄罗斯导报》的出版人米·尼·卡特科夫曾请屠格涅夫把《贵族之家》交给他的杂志发表，但屠格涅夫拒绝了，因为他已答应涅克拉索夫在《现代人》上刊登《贵族之家》。

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以后，屠格涅夫还在修改这部长篇的最后部分。12月28日，涅克拉索夫、德鲁日宁、皮谢姆斯基、巴纳耶夫、鲍特金、尼基坚科、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几个并非作家的朋友出席

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朗读会。由于屠格涅夫患了重感冒，嗓子失音，安年科夫代替他朗读。朗读会进行得非常热烈，大家都认为这部长篇是作者又一次巨大的成功。

后来在冈察洛夫家和涅克拉索夫家举行的两次文学聚餐会上，听过了《贵族之家》的彼得堡的作家们又详细而热烈地讨论了这部作品。很多人预言这部长篇会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后来，屠格涅夫自己也在《贵族之家》的序言里指出，这是他获得的最大成功。

后来，很多文艺批评家都对此作品加以评论，其中，皮萨烈夫和杜勃罗留波夫两人的意见具有重大意义。

年仅19岁的皮萨烈夫认为《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创作中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该长篇对俄罗斯生活了解得很全面，表露得也很鲜明，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皮萨烈夫指出：“在主要人物的处境中，在小说的开头都包含着很多痛苦的生活真理。”他认为，《贵族之家》的主题促使社会上的进步读者在思想上反对上流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时尚习俗。

皮萨烈夫在评论末尾写道：“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屠格涅夫不能也不应明显地说出自己的意思：他通过丽莎的个性，反映了现代妇女教育的缺点，但他在许多最好的现象中选出了自己需要的例子，然后把选出的现象安排在最恰当的场所，作家的思想因而

就不太引人注目，他的思想必须去探索，必须去深思，所以也就更充分地 and 更有力地影响着读者的意识。”这段话指出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含蓄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避免采用毫不掩饰的手段。

杜勃罗留波夫没有对《贵族之家》展开全面的分析讨论，只是顺便发表了一些意见：“拉夫列茨基的处境本身，屠格涅夫所选择的和俄罗斯生活常有的冲突本身都会使每个读者产生一连串想法，去思考主宰我们生活的一大套概念的意义所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意见和皮萨烈夫的相似，他们都认为屠格涅夫在作品中没有刻意表露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情节冲突促使读者去思考当时社会的宗教道德基础。

《贵族之家》获得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致好评。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读完《贵族之家》以后，心情舒畅多了，心头感到了温暖，对人的信赖也不难了。

《贵族之家》获得了巨大成功，俄国文学批评界毫无保留地把《贵族之家》归入俄罗斯文学的典范作品之列。

但是，作家冈察洛夫在众人对《贵族之家》的赞誉声中却指责屠格涅夫是模仿他的长篇小说《悬崖》写出了《贵族之家》，这件意想不到的奇怪事情给屠

格涅夫当时因长篇小说的成功而产生的兴奋情绪抹上了阴影。

长期以来，冈察洛夫总是和屠格涅夫交流彼此的创作计划和创作构思。他总喜欢把自己的作品读给屠格涅夫听，如《奥勃洛摩夫》。当《悬崖》还在构思中，甚至书名也还没有完全确定时，他就把一些片断读给屠格涅夫听，有时还把想好的场面、一些事件和若干章节兴致勃勃地讲给屠格涅夫听。因为他是如此重视屠格涅夫的文学鉴赏能力。

冈察洛夫的创作有一个特点，在正式写作前总要经过长时间的构思，缓慢而艰难的酝酿，所以他的长篇写得很慢，甚至得花几十年的时间。这种特点成为他患有作家疑心病的原因之一。

当《贵族之家》写完时，《悬崖》还没有最终完成。

在《贵族之家》的朗读会上，冈察洛夫听了这部小说，怀疑《贵族之家》是模仿自己的长篇《悬崖》写出来的。因为，他曾向屠格涅夫讲过很多有关《悬崖》的计划和某些细节，他认为，屠格涅夫是根据他口述的故事轮廓，浓缩而紧凑地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些精彩地方，因为他觉得《贵族之家》中有很多与《悬崖》相似的情节和人物。

朗读会结束，客散以后，冈察洛夫留下来，生气

地告诉屠格涅夫，他觉得刚才读完的小说是模仿他的长篇小说《悬崖》写出来的。

于是，屠格涅夫以他素有的温良忍让的态度同意从自己的长篇中删去丽莎姑婆向她第一次说明原因的情节，因为冈察洛夫觉得，这一段同《悬崖》中薇拉向外婆解释误会的情节相似。

但是这样一来，屠格涅夫却让冈察洛夫相信他并没有根据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了。

屠格涅夫希望尽快了结此事，向冈察洛夫提出把问题交仲裁法庭解决，但冈察洛夫却不同意，说这种事不能靠法律，只能凭良心来裁判，并且也不需要见证人。

1859年春天，屠格涅夫动身到斯巴斯科耶小住。走之前，再次向冈察洛夫澄清此事，让他去问问安年科夫，说自己曾对安年科夫讲过《贵族之家》的计划。

到斯巴斯科耶后，屠格涅夫收到了冈察洛夫的信。信中仍然咬定是屠格涅夫的错，并要求屠格涅夫走自己的路，继续短篇小说的创作，说他不管再写多少部中篇、长篇，决不能超过他自己的长诗和《猎人笔记》。尽管冈察洛夫已意识到《贵族之家》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作者声望大振，他仍然想泼屠格涅夫的

冷水，他在信里这样写道：“《贵族之家》嘛……关于它我也说不出什么，但日前在一个团体里倒有几位先生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这位先生当时曾经受到小说动力的吸引，不过他说，印象一过，记忆中留下的也就不多了；各人物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其中很多人是多余的……我把那个教师的这一评论告诉您，并非因为它绝对正确，而是因为它总算部分地证实了我对您的作品的看法……”

生性谦逊温和的屠格涅夫想竭力安抚这位激动而多疑的人：“我决不假意谦虚地对您说，我完全同意‘一位教师’对我的《贵族之家》所讲的话，但您的意思要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无穷无尽地重复《猎人笔记》吧！然而放弃写作我也不愿意。只好写一些中篇，虽然我既不自认它结构严整，人物性格典型，也不自认已经深刻而全面地洞察了生活，但却能够把我想到的发表出来……”

第十三章 “多余人”的结束，“新人”的开始

和《贵族之家》几乎同时发表的是刊登在《祖国纪事》上的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这两部作品表明“多余人”的主题已经结束。

杜勃罗留波夫刊登在《现代人》上的评论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运用一系列的文学例证表明，像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这些贵族文学中的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同生活越来越脱节，“多余人”已成为历史的过客。“做一番事业，工作！”这已经成为时代最重要的口号。现实生活需要的是新的英雄人物——实干家、战士。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十分尖锐地向当代作家们，特别是向屠格涅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今后创作方向的问题。

屠格涅夫仔细读完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以他敏锐的时代感和善于捕捉时代主要问题的才能，清楚地看到了在50—60年代社会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进步倾向。他深知，他以后作品的主人公们不应当再是像罗亭和拉夫列茨基、娜达丽亚和丽莎那样的人，而应该是生活中那些“壮士凌云”和“甘冒风险”、努力献身于社会事业的真正英雄们。

在这种创作方向的指导下，屠格涅夫写出了长篇《前夜》。

好几年前，屠格涅夫就开始酝酿构思这部长篇。

《贵族之家》刚发表，他就已经着手实现这一计划了。最初，他在草稿里是以主人公的名字“英沙罗夫”给这部长篇命名的，以后他换了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标题：“前夜”。“我给这部长篇定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我考虑到它出现的时代。那时，俄罗斯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像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新生活的预言者。”

《前夜》是一部描述新型英雄人物——实干家、战士的小说。屠格涅夫曾写道：“为了把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有自觉而真实的英雄人物，这一思想是我这部小说的基础。”小说的主人公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战士，他全心全意为自己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

很久以前，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的邻居卡拉捷耶夫曾交给他一个本子，这本自传体笔记粗略地勾勒出后来长篇《前夜》的故事轮廓。这是一个真挚的恋爱故事：卡拉捷耶夫爱上了一个少女，她也以爱相报。但是后来，她认识了一位保加利亚人卡特拉诺夫，他在他的祖国很有名，而且至今被人怀念，她爱上了这个保加利亚英雄，并同他一道到保加利亚去参加解放

斗争，不久，他就在那里病死了。在小说中，这位少女叫叶琳娜，这位保加利亚人就叫英沙罗夫。

《前夜》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853—1859年期间，当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而对于一个竭力使祖国摆脱土耳其统治的保加利亚爱国者来说，已经是行动的时候了。

英沙罗夫是一位新型英雄人物，他是平民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同俄罗斯文学中作为“多余人”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朴实、谦虚，沉默寡言却又坚韧不拔，总是为事业奔走忙碌，直率认真，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他不延误履行他所许下的诺言。他说：“我们的时间不是属于我们的。”他的整个身心都属于他的祖国，他身上体现着一种为争取祖国解放而不屈不挠斗争的坚强意志。英沙罗夫不是演说家、空想家，而是实干家。这正是当时的俄国社会所需要的。

屠格涅夫虽然在思想上已经同革命民主派分裂，但实际上，他通过英沙罗夫所颂扬的，仍然是革命民主派所固有的那些个性、性格以及思想意向上的特点。他是文学中反映这类性格的第一个作家。

屠格涅夫的几个长篇，总是敏锐而又准确地捕捉住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从《罗亭》、《贵族之家》中刻画作为贵族社会优秀代表的“多余人”形象，到现在

转而描写“新人”形象，他正逐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表现农奴制改革前俄罗斯社会的生活。

小说中的叶琳娜形象的塑造，同样是一种创新。她追求崇高的理想，渴望积极的言行，勤于思考又勇于行动，而且有坚强的意志。她周围有三个青年，苏宾是个艺术家，能热忱地工作，却缺乏冷静的头脑，有才气而缺乏坚定的意志，他不能从事严肃有益的社会活动。伯尔森涅夫性格善良，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不尚空谈，热爱科学事业，但他唯一的志愿是当教授，缺乏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两个人虽然都爱着叶琳娜，但身上都没有她所向往的品质。唯有英沙罗夫是她理想的英雄，他身上最吸引她的东西就是为解放祖国而斗争牺牲的崇高精神。英沙罗夫不但有崇高理想而且有坚实的行动，这些正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叶琳娜爱上英沙罗夫以后，毫不犹豫地同自己的亲人断绝关系，嫁给了他，并与他一同前往保加利亚，途中英沙罗夫不幸病死，叶琳娜矢志不移，没有返回俄国，坚持到保加利亚起义军服务，当了一名女护士，参加了英沙罗夫心向神往的那场斗争，以继承丈夫未完的事业。叶琳娜与《罗亭》中的娜达丽亚和《贵族之家》中的丽莎不同，她勇往直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冲破虚伪的“体面观念”的束缚，竭力从事为人们谋求幸福的活动。在叶琳娜身上，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

说，“鲜明地反映出了俄罗斯现代生活的最好愿望”。

长篇的书名含蓄地表示，俄罗斯已经进入了建立功勋和进行英勇斗争的前夜，已经处在出现英沙罗夫式人物的前夜，因为社会本身需要实际的行动。

1860年1月，屠格涅夫在彼得堡为贫穷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募捐的群众朗诵会上发表了题为《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演说，这篇论文说明了他写《前夜》的主要意图。

屠格涅夫认为，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代表着两类基本人物。奥涅金、毕乔林和罗亭这些“多余人”属于哈姆雷特类型，特点是激情与行动脱节，思想与实践脱离。堂吉诃德代表的是具有对真理的坚定信念，争取自由，反对压迫的英雄人物，具有牺牲精神的战士形象。“哈姆雷特们”看到了生活的阴暗面，然而不去斗争，只是怀疑一切；“堂吉诃德们”勇敢地投入斗争，摧毁一切不正义的东西。屠格涅夫懂得，现在已不再是空谈志向和满怀激情的时候了，应该讲求行动，需要的是新的英雄人物。而《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就是堂吉诃德似的人物。

杜勃罗留波夫写了篇关于《前夜》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论文提醒读者从“前夜”推想到明天，推想到“真正的白天”。他提出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只要俄罗斯的英沙罗夫们，争取祖国解

放的俄国战士们，展开努力的斗争，“真正的白天”就一定会到来。杜勃罗留波夫的结论是把《前夜》解释成俄国临近革命的预兆，这使政治上保守的屠格涅夫感到困惑和惊慌。他再三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涅克拉索夫完全赞同革命民主派，尽管他热爱，并且终生都热爱着屠格涅夫，这一次却拒绝满足他的要求。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还是发表了。

屠格涅夫曾向涅克拉索夫申明：“或者要我，或者要杜勃罗留波夫。”于是，这件事就成了屠格涅夫同《现代人》杂志决裂的导火线。

6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顺便提到了《罗亭》，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形象格调有点不高。评论文章没有署名，屠格涅夫便认为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更加感到委屈。终于，在10月份征求下年度杂志订户之前，屠格涅夫给《现代人》写了封信：“……请你不要将我的名字列入你们的撰稿人中，我也没有任何写成的作品……”这封信本来是托安年科夫转交的，但安年科夫考虑到不转交也许还能维持和睦，所以没有这么做。结果适得其反，涅克拉索夫对此事一无所知，依然在征求订户时将屠格涅夫的名字列在杂志的撰稿人名单中。屠格涅夫一见勃然大怒，于是，他们彻底分裂了。

《现代人》1860年1月号上刊登的论文《哈

姆雷特和堂吉诃德》成为他在这一杂志上发表的最后
一篇文章。从此，屠格涅夫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同《现
代人》杂志的一切联系。他的《前夜》刊登在186
0年《俄罗斯导报》第一、二期上。以后的几部长篇
和中篇也都投到别的杂志社去了。

第十四章 一八六一年的改革

1860年初，屠格涅夫在小范围听众中作了两次关于普希金的演讲，并在彼得堡为贫苦文学家和学者救济协会募捐，作了第一次公开朗诵，在这以后，又在莫斯科讲了一次。屠格涅夫的这几次演说奠定了为文学基金会朗诵募捐的基础。

屠格涅夫仍然同冈察洛夫经常见面，他们有时还互相朗读自己的作品，交流各自的构思。

《前夜》刊登以后，屠格涅夫把一份长篇单印本寄给冈察洛夫，请他读完后发表意见。单印本很快就寄回来，并附了一封信。从信中看出，冈察洛夫从前的疑云并未消散。他写道，他总共读了40页左右，其余的等以后有时间再读。显然，他是看了长篇开头描写的艺术家苏宾同《悬崖》里的赖斯基相似，他又加深了对屠格涅夫的怀疑。

有一次，冈察洛夫在街上碰见批评家杜迪什金，得知他是到屠格涅夫家里去吃饭，冈察洛夫立刻说了句随便而又无礼的玩笑话：“这是拿着我的钱请客。”他意思是指屠格涅夫因长篇而得到的稿费。“要讲给他听吗？”杜迪什金笑着问道。“讲好了，讲好了！”

冈察洛夫笑了一下。

后来，杜迪什金把冈察洛夫的话讲给屠格涅夫听了。屠格涅夫忍无可忍，寄了一封信给冈察洛夫，说他的话是诽谤，要求由第三方仲裁，否则就决斗。

双方选定安年科夫、德鲁日宁、杜迪什金和尼基坚科为仲裁人。这是一些“对双方都表同情的人，他们别的什么都不想，只希望消除使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破坏的导火线，因为双方都有权尊重自己的声望”。

仲裁于1860年3月29日在冈察洛夫的住所进行。屠格涅夫非常激动，但却沉住了气，一点脾气也不发。冈察洛夫回答得有点含糊，令人不能满意。他举出的中篇《前夜》和自己提纲之中的相似之处不大令人信服。因此，他显然失败了。他最后也承认，他犯了多疑病，把事情夸大了。

安年科夫在仲裁结论中写道：“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著作，由于产生在同样的俄罗斯土壤里，因而也必然会有某些相似之处，必然会在若干见解和表达上产生偶然的巧合，所以双方都应谅解和致歉。”

冈察洛夫对此决定表示满意。但屠格涅夫却不是这样。他的脸色苍白，坐在圈椅里，声音发颤地对冈察洛夫说道：“我与您之间发生的事情，现在算是结束了。但我必须对此补充最后一句话，我们的友好关

系从此结束。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使我清楚地懂得，朋友间的交换思想，纯朴而相互信赖的来往可能出现多么危险的后果。我仍然崇拜您的天才，我大概还会不止一次地和别人一起赞美你的天才；但从今天起，我们之间像从前那样诚恳知己、开诚布公的交往是不可能了。”说完，他向所有人点了点头，走出了房间。

不管屠格涅夫和文学界的关系以及私人间的交情变化如何，他的作家声望一直在不断提高。1860年11月24日，他被一致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1860年春，屠格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喉病加剧，在医生的坚持下，他离开俄国到国外矿泉区作水疗。屠格涅夫在巴黎租了一所房子，同女儿住在一起。为了女儿前程，也是为了养病，屠格涅夫才不得不呆在巴黎。然而他的整个身心却都在俄国。屠格涅夫跟往常一样，虽然远离故乡，但却始终非常强烈地热爱着它，热爱着虽说并不美丽，然而却十分熟悉和宝贵的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他在11月份写给费特的信中说：“实话告诉你，我对法国的一切，特别是巴黎的一切，憎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我又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我们不谈这些吧。您的来信不仅使我高兴，而且使我振奋：我从这些来信中嗅到了俄罗斯秋天的气息，嗅到了翻耕过的大地微带凉意的清芬，嗅到了刚刚栽植上的灌木丛的馥郁，嗅到了谷物干燥

室、炊烟粮食的芳香。”

不管屠格涅夫落脚在哪里，他始终关心着俄国的现实生活。他在英国怀特岛进行海水浴疗养时，在那里制订了在俄国开展扫盲和推广初等教育的计划，他曾在斯巴斯科耶建立了一所学校，并一直关心着这所学校。

但作家在国外的主要工作，还是创作他的新小说《父与子》。1860年10月，小说的写作提纲连“细微末节都已拟就”，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日记，记载小说主人公巴札罗夫的生活与活动，以确定在生活中的每一种场合，巴札罗夫该怎样行动，如何表现自己。这样，就使主人公形象栩栩如生，鲜明完整。

同时，屠格涅夫激动地盼望着农奴制改革的实现。1861年2月19日，沙皇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由于渴望亲眼见到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想念亲爱的斯巴斯科耶和自己的朋友，希望在那里顺利写完《父与子》，屠格涅夫于4月赶回祖国。

5月初，屠格涅夫便来到斯巴斯科耶。他减少了农民五分之一的赎金，在主要领地上，则无偿转让庄园土地，以后每年还给农民送建筑木材。

然而，农民对改革一点也不满意，他们虽然盼到解放，但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奴役——恶霸富农的奴役，受到城乡资本势力的控制。他们现在不得不按照“规

定”，根据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种土地，实际上又重新落入了依附于地主的境地。

屠格涅夫已经意识到这点，他后来说：“这种现象确实不可等闲视之，也不能置之不理。看来，没有富农的村庄很快就要绝迹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会像毒菌那样繁殖起来，而且鬼知道他们又在干什么。这是一些强盗。我想写一部短篇小说来描绘一个这样的能手，给他取名‘万能的日特金’。他是我们原来农民的一个邻居。他不仅剥削他们，抽他们的苛捐杂税；几乎每天都在赶走他们的牲口，罚他们款，还掠夺他们的土地，挪动土地界碑，移动界桩。”

屠格涅夫认为，改革以后，农民仍然将地主视为仇敌。有一次，他给俄国自由主义诗人波隆斯基不无辛辣地讽刺描绘了这样一幅假想的场面：“清晨我们坐在凉台上，悠闲地喝着茶。这时，看到从教堂那边沿着花园走过来一群斯巴斯科耶村的农民。他们朝我们脱帽鞠躬。我问他们：‘喂，弟兄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回答说：‘你可千万别见怪，也不要抱怨。你是一个仁慈的老爷，我们对你也很满意，不过不管愿意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把你……吊死。’‘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命令！我们连绳子头也准备好了……你就祷告一下吧……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本来不是什么凶手……’”

受骗的农民掀起了起义浪潮作为对改革的回答。为了对付这些起义，沙皇政府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一切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进行扼杀。

屠格涅夫回到斯巴斯科耶以后，安下心来，在乡下这个僻静地方进行《父与子》的写作。

5 月底，托尔斯泰来看他，他们一起到离斯巴斯科耶六七十俄里的费特的庄园去探望他。就在那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间突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当时，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女主人询问屠格涅夫是否满意那位教她女儿的家庭女教师。屠格涅夫对她十分称颂，并说，她以她认真的态度请他确定一笔钱的数目，以便他的女儿可以把这笔钱用于慈善事业。

“现在，这位英国女人又要求波莉娜亲手补好一件穷人的破衣服，然后还给本人。”

“您认为这也算好事吗？”托尔斯泰问道。

“当然，这可以使女善士对贫困有所了解。”

“可我却认为，这不过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女孩把又脏又臭的破布片放在膝盖上虚情假意地演演戏而已。”

“我请您别说这种话！”屠格涅夫嚷道。

“我干吗不可以说我认为完全是正确的话。”托尔斯泰理直气壮地答道。

屠格涅夫失去了自制力，激动得从桌旁跳起来，

双手抱住脑袋，脸色发白，大声说：“我就是要您别开口污辱别人！”说完这话，他就走开了。

屠格涅夫立刻就动身回斯巴斯科耶，托尔斯泰也离开了费特庄园。

屠格涅夫当天从斯巴斯科耶寄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再一次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请他原谅。

这场几乎要诉诸决斗的争吵使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分手了整整17年。

第十五章 创作最高峰

1861年7月，《父与子》脱稿。秋天，屠格涅夫向朋友们朗读了作品的手稿，听到了对长篇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价。有的人劝屠格涅夫赶快把手稿付之一炬，有的人却把《父与子》作为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屠格涅夫心平气和地听取朋友们直率的意见。尽管各种矛盾意见使作家觉得左右为难，他还是着手修改自己的作品。隔了半年，才发表在1862年的《俄罗斯导报》二月号上。

毫无疑问，屠格涅夫犯了一次策略上的错误。由于同《现代人》的决裂，他把长篇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这份杂志在进步读者的心目中，那时已日益背上反动刊物的名声了。

这一时期，国内形势更加复杂。被沙皇政府欺骗了的农民掀起了新的暴动浪潮。为了对付这些起义，沙皇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扼杀一切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政府关闭了主日学校、平民阅览室，中止了一些报刊杂志的出版，《现代人》被查封了8个月。

屠格涅夫在这些日子写道：“当我读完了关于查

封《现代人》的命令以后，我这颗老作家的心颤抖了一下。我记起了它的创办经过，别林斯基和其他很多事……”屠格涅夫虽然已同《现代人》决裂，但他仍然对这份曾记载着他的文学道路，影响过他的文学生涯的杂志怀有一份深深的情感。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在这部作品里，他的天才已经完全成熟并得到了有力的发挥。可以说，这部作品在最优秀的俄罗斯社会小说中名列前茅。

小说写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札罗夫大学毕业后到贵族出身的同学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家中小住，巴札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和基尔沙诺夫家的父辈格格不入。两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宣扬贵族制度的原则，指责巴札罗夫否定一切，是虚无主义。巴札罗夫痛斥了对方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在辩论中得胜。随后巴札罗夫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奥津左娃，并去她的庄园作客。阿尔卡狄热恋上她的妹妹，而巴札罗夫对奥津左娃也产生了爱情，但遭到拒绝。不久之后，两位青年人回到基尔沙诺夫庄园，阿尔卡狄已经转向于安乐地享用父亲的产业。巴札罗夫则埋头于生物研究工作。但巴威尔对巴札罗夫仍恨之入骨，伺机挑起了一场决斗。巴威尔负了轻伤，巴札罗夫次日

回到父母家中，后来在为伤寒病死者解剖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的手指，受感染而死。

长篇在杂志上发表后，读者中间立刻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责备作者，说他嘲笑了从前曾经正直地活动于社会生活舞台上的“父辈”，并且盲目地美化了接替他们的年轻一代。另一部分人却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长篇对年轻一代进行了恶毒讽刺，对父辈则大加赞扬，甚至还有人写信给屠格涅夫说，他们因为他侮辱了年轻一代而在“轻蔑的大笑声中”烧毁了他的相片。

作者写此长篇小说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曾这样说：“我的整部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阶级当作进步阶级的，请看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阿尔卡狄的父亲）、巴威尔·彼得诺维奇与阿尔卡狄这几个人吧，他们多软弱，多萎靡，眼光多狭小。我顺从我的审美感觉挑选出贵族方面好的代表人物来证明我的主题：倘若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最后一句话是说奶油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如果是坏的，那么牛奶当然就更坏了。屠格涅夫借此作为比喻，意思是指精华部分尚且是坏的，其余部分就更不用提了。也就是说，巴威尔和尼古拉作为贵族阶级的优秀代表，却仍然是无能空虚的，那么整个贵族阶级就更是落后的了。所以，这部长篇的主题思想在于表

达“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即以巴札罗夫为代表的“子辈”——平民阶级对以巴威尔为代表的“父辈”——贵族阶级的胜利。

屠格涅夫本人是属于贵族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但他在《父与子》中，通过对基尔沙诺夫一家的描写，在客观上表现了贵族自由主义思想的必然崩溃。正如他曾就《父与子》一书这样写道：“……准确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乃是最大的幸福，即使这种真实与他自己的爱好并不一致。”这体现了屠格涅夫坚定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父与子》全篇的结构，自始至终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屠格涅夫作为文学大师，善于描述新型人物与旧的心理、思想及生活方式的冲突，这种对比手法，使他在《前夜》中描写英沙罗夫，获得了极大成功。在小说《父与子》中，又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在那些贵族的衬托对比下，巴札罗夫的形象鲜明突出。他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是体现了俄国文学史上继“多余人”形象以后的“新人”特点的典型形象。他有坚定的信念，坚信现存制度必然会被彻底摧毁。地主制度已经腐朽透顶，连同它所有的“规定”在内都应当完全、彻底被摧毁，这就是巴札罗夫的立场。他有明确的爱憎，憎恨农奴制度，否定贵族阶级，以自己的平民出身而自豪。巴札罗夫鄙视贵族阶级约定

俗成的礼节，他朴实、自信、随和，很容易同普通人交朋友，却没有在贵族圈子里讨一个良好印象的思想。在巴札罗夫身上，体现了一种强大的、崭新的、先进的东西。民主主义者巴札罗夫是俄国解放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的先进思想的代表者。

但是屠格涅夫由于受他的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所局限，并不相信巴札罗夫的理想和事业，因而对主人公形象也作了某些歪曲。屠格涅夫虽然写了巴札罗夫平易近人，爱接近农民，又指出他对农民有轻蔑的看法，而在农民眼里，他又成了“一种打诨的小丑”。特别是对巴札罗夫同奥津左娃的关系的描写，更看出作者思想的局限。巴札罗夫大胆地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否定爱情，待到住在奥津左娃的庄园时，竟受到她的影响。改变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直至堕入了情网，而当遭到奥津左娃的拒绝时又心灰意懒，似乎连坚定的信念也动摇了。此外，作者把巴札罗夫叫做“虚无主义者”，让他早早地死去的写法也多少反映了自己的爱憎。作者认为革命前途渺茫，不相信巴札罗夫的事业能够胜利，所以主人公的结局也是悲惨的。

当时的批评界、文学界都关注着《父与子》。

著名文学批评家波萨烈夫认为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所具有的艺术家的真诚而纯朴的天性发挥了作用，说它摧毁了理论上的局限，战胜了思想的谬误。

1862年3月，屠格涅夫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他对《父与子》的意见，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父与子》置于屠格涅夫所有作品的首位，并把这部长篇的意义同果戈理的《死魂灵》相提并论。通过屠格涅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作品理解之深刻。回信说：“我十分信任的一些人……郑重其事地劝我把我的作品付之一炬……说巴札罗夫这个人物一点也不成功。试问这怎么能不叫人疑惑不解和无所适从呢？……因此我再一次表示感谢。您对我想通过巴札罗夫来表达什么这一点理解得如此全面，如此细致，我只有表示惊叹，并佩服得五体投地。您的确深知我心，甚至听到了我认为不必要讲出来的话。但愿这里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行家的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是一个读者单纯的理解力——也就是说，但愿大家都能看出您所看出的哪怕一部分也就好了！……”

年纪较轻的作家契诃夫则为《父与子》的写作技巧而赞叹不已，拍案叫绝。他不止一次地读这部长篇，对第27章的印象特别深。在他后来的作品《跳来跳去的女人》里对戴莫夫的病和死的细节描写可能就是受到《父与子》结尾一章的启发。

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1862年5月，屠格涅夫到伦敦赫尔岑那里去。在那里见到了从西伯利亚流放逃亡出来的巴枯宁。得知巴枯宁的妻子还在西伯利亚以后，屠格涅夫便四处奔波，不辞劳苦，替她获得了出境许可。此时，他还答应一定资助身无分文的巴枯宁，每年给他1500法郎。

老朋友们在一起只聚了三四天，有赫尔岑、奥加辽夫、巴枯宁和屠格涅夫。所有这些时间他们主要都是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中度过的。争论的问题有：关于俄国和西欧未来的发展道路，关于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关于社会主义，关于艺术，而争论最多的是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有关农民解放的迫切而又尖锐的问题，他们还争论地方自治会是否必要……

屠格涅夫和赫尔岑虽然有着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完全一致。屠格涅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政治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屠格涅夫不接受俄国的发展要走革命的道路这一意见，即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他认为可以通过在人民中逐步传播文化和知识来得到进步和自由，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

他曾给赫尔岑写信说：“你得相信。有效的革命宣传的唯一支柱是俄国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尽管他们被巴枯宁称为腐败而又脱离乡土的变节分子。”

政治局势的紧张更加使他们互相疏远，尽管伦敦的流亡者们仍然认为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自己人，即使不是同盟者，也还是同路人，但他们不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

5月底，屠格涅夫辞别了朋友们，动身回俄国去。在去斯巴斯科耶以前，他先到彼得堡，那里很不安宁。城里起了大火，烧光了整片整片的街区，人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身背包裹，踟蹰流浪在街头广场。彼得堡警察局和反动集团散布谣言，说这是革命青年放的火，实际上大火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那时，屠格涅夫感到惊讶的是：出自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这个词已成为很多人的口头话了。他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这样向他感叹：“请您看看，您的虚无主义者们干的好事！他们在烧彼得堡！”

作家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些他“想要去握的手”却揍他，而他准备退避三舍的“另一些人的手”却又来爱抚他。这些本来意气相投的人们对他的冷淡和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庆贺”向他表明，他在《父与子》里显然犯了某种错误，或者至少写得不够清楚，以致

那些使尽一切手段抨击解放运动思想的反动派竭力想利用这一缺点。

就在这几天，他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契的书店去了两次，把赫尔岑给他带来的一包重要书稿交给店主，并在募捐单上签了名，捐赠了一笔款子给火灾灾民。他还走访了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创办的《时代》杂志编辑部。

过了几天，屠格涅夫就动身到斯巴斯科耶去了。碰巧，他与涅克拉索夫乘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并一直乘到莫斯科。

小说《父与子》问世时，屠格涅夫已不再与《现代人》杂志保持联系，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断绝了。一年前，涅克拉索夫就想跟老朋友和解，他写了一封信给屠格涅夫。信中写道：“亲爱的屠格涅夫，想要听到你的讲话和想要写信给你的愿望终于使我烦恼透了。起初我没有写信给你是因为不想写；后来没有写信是因为我觉得你在生气；再后来我还是没有写，那是因为别让你觉得我的信是要强求友谊等等。”信中还谈到自己写这封信不是为《现代人》张罗一些小说，而是出于个人情感，“因为我老想到你才写的”。屠格涅夫很快就回信了，拒绝给《现代人》撰稿。涅克拉索夫又写了一封短信，那是他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

“我仍然是一个爱着你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感激你的人。”

如今他们居然一道乘车去莫斯科了，他们谈笑着。但是，据屠格涅夫讲，“隔阂”依然在他们中间存在着。

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一反常态，他在这里根本没有写作，只是研究历史学家、民主主义政论家夏波夫的《地方自治和分裂》，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屠格涅夫的兴趣，是因为在伦敦时，他和赫尔岑他们谈了不少有关俄国地方自治的意义的问题。

1862—1863年，《钟声》刊登了赫尔岑写的一系列书信体文章，总标题为《终结与开端》。为了保密，没有对书信的收件人称名道姓。这位收件人就是屠格涅夫。赫尔岑在第一封信里就明确地说，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屠格涅夫只是个同路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各奔前程了。他对屠格涅夫写道：“好吧，上帝保佑，我们要分手了，作为友好的同路人，在友爱与和睦中分别吧。”

1863年2月，沙皇政府根据“关于与伦敦的宣传者有牵连的被告人”案件（该案件被称为“第三十二号诉讼案”），对屠格涅夫进行起诉。当时，屠格涅夫已在外国。年底他就已经听到传闻，说在最近的将来，他将被传到彼得堡，向枢密院提交供词。

政府采取的行动使屠格涅夫焦躁不安。他把哥哥叫到巴黎，以便同他商量，如果庄园不久有被没收的危险的话，那就先把它卖掉。

屠格涅夫写信给安年科夫说：“我不能设想，他们究竟指控我些什么。我实在不能认为，他们是因为我同那些流亡的、我们在政治信仰上早就分手了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有来往而迁怒于我，我算个什么政治人物呢？我，是个作家，一个独立的、但却是有良心的和温和的作家，如此而已。”

屠格涅夫在巴黎接到了经由俄罗斯公使发来的正式传票。他没有接受这种传讯，只是请求将“传讯理由”寄到巴黎，并听从公使的劝告，向沙皇呈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的信仰属于“温和派”，“虽然独立不羁，但却诚挚善良”。

传讯理由寄给了屠格涅夫，主要原因是关于他同赫尔岑、奥加辽夫和巴枯宁的关系问题。1863秋，跟着来了第二次传讯，但是屠格涅夫再一次回避了它。1864年1月，他还是不得不回去作证。但枢密院委员会已不再认为屠格涅夫是“危险分子”，无论是“诏节”，还是签名具结，都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他在给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信中说：“我的六位审判官都乐意同我东拉西扯谈一阵子……”根据枢密院裁决，就这一案件对作家免于起诉。

赫尔岑起初本以为屠格涅夫会帮助揭发“第三十二号诉讼案”的可耻实质。当他知道屠格涅夫向亚历山大二世呈递了保证书以后，猛烈地指责了他的这一做法。1864年1月，《钟声》上登出了一篇关于屠格涅夫向沙皇悔过的措辞恶毒的简讯。其中写到：“一个白头发的马格达林，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坐卧不宁，连白发和牙齿都掉了，她因为皇上还不知道她悔过而难受，所以‘断绝了同青年时代的朋友们的一切联系’。”

屠格涅夫同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友谊就这样中断了。“父亲和指挥官”、亲爱的朋友和导师——别林斯基早已入土；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事业的继承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现代人》的中心人物在60年代初就已决裂，走上不同的道路；现在又与赫尔岑以及流亡伦敦的其他俄国民主主义者断绝了关系。

1864年1月，屠格涅夫参加了在斯摩棱斯克墓地举行的德鲁日宁葬礼，涅克拉索夫、费特、冈察洛夫、安年科夫、鲍特金和其他很多文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屠格涅夫请安年科夫告诉冈察洛夫他想跟他握手。冈察洛夫感得很高兴，这次会见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关系。

就在那年春天，屠格涅夫从巴黎写给冈察洛夫的

第一封信里说，他高兴的是“由于共同的经历、志向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恢复了同他的友好关系。屠格涅夫还写道：“我们也有些像最后的莫希干人了呢。”

“莫希干人”是北美因欧洲人的殖民政策而衰亡的一种印第安民族。“最后的莫希干人”比喻某种衰亡人物的最后残存者。在长篇《罗亭》中，列兹涅夫对罗亭讲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兄弟；咱们都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往昔，当我们前面正是来日方长的年代时，我们可以各奔前程，互为寇仇，但现在，当我们周围的人群已经烟消云散、日见稀少时……我们必须紧紧地互相扶持。”这几句话道出了屠格涅夫如今的心声。

第十七章 一切如“烟”

同革命民主主义派断绝关系后，屠格涅夫在国外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回俄国的次数越来越少。

1864年春天，波丽娜·维亚尔多在巴黎歌剧院举行告别演出，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但这位女歌唱家意识到，她的歌喉已丧失了从前的魅力，她退出舞台的时刻已经到来。维亚尔多夫妇憎恨拿破仑三世及其制度，离开了法国，移居到德国巴登—巴登，他们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城郊买了一所别墅。波丽娜·维亚尔多在这座别墅里办了一所欧洲最好的声乐学校。

屠格涅夫在维亚尔多别墅的旁边买下了一块地，给自己盖起了一幢私人住房。从此，屠格涅夫也在巴登居住了下来。

屠格涅夫为女儿和她那位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在巴黎租了一套小小的住房，他常去看她们。1865年2月，女儿出嫁，做父亲的热忱地参加了女儿的婚礼，感到无比幸福。屠格涅夫对女婿印象很好，认为他漂亮、善良而又能干，他觉得他的女儿会得到幸福，因为新婚之家在物质上是有保障的：波丽娜(屠

格涅夫的女儿)得到父亲一份富裕的嫁妆，她丈夫加斯顿·勃留艾是一家玻璃厂的厂主。不久后，屠格涅夫有了外孙们。屠格涅夫本人从未尝到过家庭幸福，他特别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然而，生活无情地欺骗了父女俩。加斯顿破产了，并且挥霍了妻子的所有嫁妆。夫妻之间不和，美满的家庭被彻底破坏。波莉娜带着孩子，没带任何财物，离开丈夫跑到瑞士。屠格涅夫虽然已经年迈苍苍，病情严重，仍然尽可能资助她，帮助她躲藏起来，甚至临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巴登以矿泉疗养、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而闻名，这里的写作环境很好。但屠格涅夫长期以来写作不顺心，同《现代人》的破裂，同赫尔岑、奥加辽夫等的分歧，与“第三十二号诉讼案”的牵连，一些报刊对《父与子》的猛烈抨击，这一切都使作家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同时，在思想上他也极其彷徨，面对俄国继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难以决断该何去何从。他离开了革命民主派，却又不愿与反革命阵营同流合污。他竭力想在他不赞同的革命思想和他憎恨的农奴精神之间，寻找某种中间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屠格涅夫的写作速度大大下降了。从前，在短短的时间里——1855年到1861年——他创作了4部优秀长篇：《罗亭》、《贵族之家》、

《前夜》、《父与子》，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可是现在，从1862年直至1867年底，他只创作了几个短篇和一个长篇《烟》。 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悲观主义，证明了屠格涅夫在这一时期所经受的思想危机。

《烟》是作者于1865—1867年之间写于巴登-巴登。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巴登， 然而作品描写的中心却是俄罗斯人和农奴制改革后几年俄国生活中的问题。

小说重点描写了聚集在巴登—巴登的俄罗斯贵族，他们的中心是一个将军小团体。屠格涅夫对构成俄国专制制度支柱的这些人物，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准确地击中了要害。屠格涅夫说：“《烟》中的将军们我写得很成功，准确地击中了要害。您知道，在《烟》出版的时候，那些真正的将军们非常生气，有一天晚上，在英国俱乐部里，他们本来已准备好要集体给我写一封信，想把我从他们的社交圈子里开除出去……真了不得，对我来说，要是真能得到这样一封信该是一件多大的喜事！我会把它镶在金框里挂在墙上呢！”

小说的主人公李特维诺夫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他不是个坚强而勇敢的当代进步英雄人物，也不是革命民主派，他不过是个贵族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逐步改良，但是由于性格软弱，遇事优柔寡断，不但在改

良社会方面毫无成效，而且在个人的爱情生活方面也彻底失败了，所以感到浮生如梦，“好像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都是烟”，小说具有浓厚的颓废情调。

这样一来，曾经塑造过英沙罗夫和巴札罗夫形象的作家，如今在他这部小说里不仅没有一个主人公是活动家，没有一个主人公是战士，而且连英勇的解放斗争思想本身也不要了，带给读者的是表现得十分萎靡不振的自由主义渐进派的思想。

因为《烟》的关系，屠格涅夫被“所有的人指责：赤色的，白色的，上层的，下层的，从侧面的，特别是从侧面来的指责，”“还从来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因为《烟》的关系挨过这种四面八方一齐出动的斥骂。”石块从四面八方屠格涅夫飞了过来。

批评家皮萨列夫指责屠格涅夫在小说中以李特维诺夫的眼光来观察俄罗斯生活现象，而李特维诺夫正是《父与子》中那个只说漂亮话不干实事软弱无能的阿尔卡狄。皮萨列夫还提出屠格涅夫是“站在这个矮小而又松散的蚂蚁土墩上来认识问题，辨认方向”，而忘了使用他曾经亲自发现并描述过的真正的了望台。

赫尔岑在《钟声》上发表的文章《父辈已变成祖辈》中指出，屠格涅夫脱离革命民主派已经越来越远。

在巴登治病的冈察洛夫，同屠格涅夫见了面，他

对《烟》的评价也是大加否定的。他说：“我读过它，但觉得枯燥乏味……这一次您的笔失灵了，它背叛了您和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比这还要厉害，他在屠格涅夫家作客时，看到桌子上有一本《烟》，就一把抓起来，挥舞着，嚷道：“该让刽子手把这本书烧掉！”

屠格涅夫了解《钟声》对小说《烟》的批评，但他仍旧将这部书寄给了赫尔岑。赫尔岑友善地对待了屠格涅夫的这一行为，他们终于言归于好，因为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耿耿于怀，而且每个人都仍然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对方的活动。屠格涅夫给赫尔岑写道：“……你已经55岁，我明年也是个50岁的人了……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的过去，由于我们出世的时间等等，比起异龄人们来，我们终究还是彼此更接近，更易于相互了解的。”

他们恢复了通信关系。1869年春天，屠格涅夫给赫尔岑寄去了一张相片，赫尔岑一看那照片就发现，屠格涅夫老了，满头白发，不过仍保留着当年的优雅气质。1870年1月中旬，两人在巴黎相会。会见是愉快的，情绪是激动的。但当屠格涅夫第二天再去找赫尔岑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发高烧，患了肺炎。医生不让任何人走近病人。5天后，屠格涅夫离开了巴黎。1月20日，赫尔岑去世了。屠格涅夫从

报上得知这个消息，他在巴登写道：“不管我们的意见有过怎样的分歧，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失去的毕竟是一位老同志，老朋友。我们的人一天天稀少了……”

第十八章 走出“烟”之笼罩， 走近革命青年

小说《烟》问世后，屠格涅夫越来越频繁地思念往事。回想起同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凯维奇的友谊；同别林斯基的接近，别林斯基曾亲昵地称他为“孩子”，并吓唬要罚他“站墙角”；是《猎人笔记》使他获得了一个优秀艺术家和俄罗斯最进步的人士之一的荣誉；他的一些长篇获得空前成功；在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杂志社工作……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亲近的人了。

屠格涅夫本人感觉到，他的作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反映真实的俄国现实生活，长期侨居国外妨碍了他的创作。于是，70年代的屠格涅夫又重新返回到《猎人笔记》文集中，去回忆那些尚未成稿的旧有的构思，整理很久以前的草稿，又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和《活尸》。屠格涅夫常在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朗读《猎人笔记》中的故事。他亲眼看到这些故事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相反人们对它们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屠格涅夫重温《猎人笔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过去那段

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对作家与俄罗斯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那段历史的回顾。

屠格涅夫虽然侨居国外仍一如继往地关注着俄罗斯文学，关心着文学新秀和新的天才作品。他热烈欢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辛辣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他把这篇作品与世界闻名的英国政治讽刺小品文作家约翰·史惠夫特的优秀作品相媲美。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使屠格涅夫想了很多，在许多问题上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然而他仍然为俄罗斯产生了这样的天才而骄傲。

屠格涅夫侨居国外时，担负起了在欧洲热情宣传俄罗斯文学的任务。他在法国和英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他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个城市的历史》的文章和评论等。他向欧洲文学家介绍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冈察洛夫的作品，还亲自同法国作家鸠朗一起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在国外介绍俄罗斯文学时，既强调了它的世界意义，又强调了它的独特性，它与俄罗斯生活及俄罗斯人民的紧密联系。屠格涅夫曾向法国杂志《十九世纪》这样介绍：“列夫·托尔斯泰是当代俄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而《战争与和平》，恕我冒昧地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托尔斯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作家。”

1870年夏，屠格涅夫到俄国作短期停留。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这使他急于回到巴登—巴登。途中得知已经宣战。

起先，巴登—巴登一切都很平静。6月18日还在那里举行了国际循环象棋比赛的开幕式。屠格涅夫被选为这次比赛的副主席。他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一位狂热的棋迷。他经常去巴黎蕾朗咖啡馆，在那里，可以碰到一些最著名的棋手，屠格涅夫曾和他们交过手。

然而，这里的宁静气氛很快就被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居民们急急忙忙离城而去，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一家决定在巴登—巴登暂留一些时候。

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政体非常痛恨，因此极希望德国人取胜。因为他们认为，要是拿破仑帝国存在，欧洲就不能自由发展。然而当法国接二连三地吃败仗，拿破仑三世政体崩溃后，德国军队公然充当侵略者角色，与法国资产阶级相勾结，消灭了世界上第一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府——巴黎公社，屠格涅夫感到了不安，他曾写道：“笼罩着整个德国的征服者的贪心并不是令人特别乐观的。”

德国军队对被征服国家施加的、有损其民族尊严的暴力，引起了一个俄国人道主义作家的反对，因为他真正爱护和尊敬法国人民，承认它对过去历史所起

的伟大而光荣的作用。

战争使维亚尔多不能在巴登—巴登进行教育工作。1870年深秋，维亚尔多一家迁到了伦敦。屠格涅夫随后也到了那里。在英国，他开始了大型中篇《春潮》的创作。1871年底，他们来到了巴黎。

屠格涅夫虽然身在国外，仍然关注着俄国现实社会。作家几次返回故乡，亲眼看到俄国农村萧条败落、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惊心动魄的死亡现象。农村的财主富农取代以前农奴制的地主，甚至变本加厉。贪污、舞弊、形形色色的讹诈欺骗行为充斥整个官僚专制制度。

1875年屠格涅夫写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比我们生活过的青春时代更加龌龊。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得紧紧的一扇门；而现在，门似乎开了一条缝，然而要进去却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政治上的“温和”、“中庸”已越来越不可能。如果说作家在60年代同他认为过激的革命朋友断绝了关系，那么现在，他开始同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决裂。

赫尔岑曾责备屠格涅夫，说他不该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卡特科夫编辑的《俄罗斯导报》。屠格涅夫承认，他本人也为此感到不快，但因为杂志本身还不坏，而且付给作者的稿酬是认真的。

到了70年代中期，卡特科夫的名字同俄国政府反动派最黑暗的勾当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屠格涅夫切实痛恨了起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作品了。

诗人费特是屠格涅夫多年的朋友。到了70年代，两人的关系也破裂了。费特到处奔波，呈请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宪欣——这是他继父的俄罗斯贵族的姓氏，他指望姓氏的更改，能最终确认他贵族称号的荣誉。屠格涅夫为此向他写道：“……作为费特，您曾经有过名字，作为宪欣，您却只有一个姓氏了。”1873年，根据费特建议，对《欧洲导报》杂志采取了书刊检查镇压手段，这件事使憎恨沙皇书刊检查的屠格涅夫勃然大怒。

在同这些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决裂的同时，屠格涅夫同俄国先进的人们逐渐建立与加强了一些新的关系。他同革命民主派在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建立了友好关系，屠格涅夫认为他使自己想起了别林斯基。

同时，屠格涅夫与俄国革命侨民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经常给民粹派分子拉夫罗夫寄钱，资助他在国外出版《前进》杂志。他在巴黎结交了盖尔曼·洛巴青，这是一位革命民粹主义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译者，曾勇敢地试图组织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逃出

流放地。

1875年2月17日，屠格涅夫在巴黎组织了一次《文艺之晨》音乐朗诵会。维亚尔多也参加了演出。屠格涅夫朗诵了自己的短篇小说《车轮在响》和乌斯宾斯基的特写《代表们》。这次募集的资金为穷苦学生在巴黎创办了一座俄罗斯读书室，又称“屠格涅夫图书馆”，或简称“屠格涅夫馆”。该读书室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屠格涅夫在70年代结交的俄国革命侨民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相信农民村社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认为农民村社孕育着社会主义胚胎。因此他们主张“到民间去”，到农民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号召农民起来同专制主义和地主作斗争。屠格涅夫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当然不会相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就会走到社会主义。可是另一方面屠格涅夫看到了民粹派青年炽热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决心为正义而勇敢斗争的精神。他虽然不相信他们的事业能够胜利，但他钦佩他们真诚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他热爱他们。

为了纪念这些革命的民粹派，屠格涅夫创作了一部长篇《处女地》。这部小说他在国外构思了很久，然后在斯巴斯科耶用了差不多一个春天，使整部小说脱稿，1877年初发表于《欧洲导报》杂志。屠格

涅夫为此书曾写信给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我要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注入这本书里。谁知道，我或许命中注定还能点燃起人们胸中的烈火。”这是作者最后一部小说。

小说反映了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书中写民粹派青年涅日达诺夫到自由主义贵族西比雅京家任家庭教师。他不顾保守派贵族卡朗米亚采夫和自由主义者西比雅京的破坏，多次与民粹派一起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他赢得了西比雅京的外甥女玛利安娜的爱慕，两人为了共同的事业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寄居到厂主沙罗明的工厂里。但是涅日达诺夫的事业并不顺利，满腔的革命热情不被农民所理解，反而常常受到他们的嘲弄，终于由怀疑、动摇走向绝望而自杀。小说以民粹主义者的悲剧收场，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他坚持反农奴制的一贯立场，讽刺保守派贵族，同情民粹派，也否定民粹派的革命斗争。

反动的评论界极端仇视《处女地》。许多民粹主义者则赞扬了它。民意党人在屠格涅夫去世后发表的传单中宣传：“渗透在《处女地》中的和在许多地方掩饰着的那种微妙的讥讽，使我们深感痛心，却没有影响我们对屠格涅夫的热爱。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讥讽……是发自热爱和关怀青年的那颗心。”

第十九章 扎根在祖国大地上

屠格涅夫移居巴黎之后，同许多法国作家结成了亲密的朋友。

早在1857年，屠格涅夫就结识了梅里美。梅里美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学和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屠格涅夫曾协助梅里美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有时还亲自参加。梅里美也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一些中短篇，校订了小说《父与子》的法译本，并且为它写了前言。

当屠格涅夫迁居巴黎时，梅里美已不在人世。

法国老一辈作家中，同屠格涅夫熟悉的是乔治·桑。40年代，屠格涅夫还没在欧洲闻名时就通过巴枯宁介绍与乔治·桑相识。后来，《猎人笔记》的法文译本出版，乔治·桑开始熟悉这些作品，她给密友福楼拜信中说：“我对他(指屠格涅夫)了解得很少，但他的作品却能背得出来。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写得别具一格，有声有色！”她对屠格涅夫后来的短篇《活尸》给了很高评价。屠格涅夫在国外与乔治·桑建立深厚友谊以后，她便成了他最热爱的女作家。乔治·桑曾竭力促进屠格涅夫和福楼拜的友谊。

由于共同的文学审美感、对艺术的热爱和渊博的学识，还有相似的性格，屠格涅夫和福楼拜喜欢呆在一起，他们觉得，他们的话永远没有谈够的时候。双方的爱慕之情逐渐发展成了牢固的亲密友谊。

70年代在巴黎，屠格涅夫经常参加所谓“福楼拜午餐会”，参加这种午餐会的还有左拉、都德、莫泊桑，推心置腹地谈论文学，“没有阿谀奉承，没有互相吹捧”，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新作来到这里，互相切磋。屠格涅夫曾带去了《活尸》和《处女地》。

据莫泊桑回忆说：“我第一次同屠格涅夫见面是在福楼拜家里。门打开了，出现一个巨人，就像西欧童话中所讲的那样，一个银白色脑袋的巨人。那长长的白发，浓浓的白眉，再加上那把白色大胡子，真把他笼罩在一片银白之中；这一片银白又衬托着一张容光焕发、轮廓稍微显得宽大了些的面孔，看上去仁慈而安详。”

屠格涅夫令人惊服的是他那异常渊博的文学知识。莫泊桑称自己是屠格涅夫的学生。他认为屠格涅夫大大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他对于这位周游各地、熟悉当代所有最伟大的人物，博览群书，能操欧洲所有语言，其流利程度如同本民族语言一样的天才小说家，极为钦佩。

午餐会上，有一次谈到歌德，屠格涅夫说：“我

的朋友们，你们对他并不了解。”第二次聚会时，他便带来了歌德的一本小册子，立即打开这本德文书，用法语读了起来。在座的各位文学家为他的“即兴译读”震惊不已。一个俄罗斯作家，竟能直接从德文原著用法语给法国人翻译一个德国天才作家的作品，如此流利生动。

但是屠格涅夫谈得最多的还是俄罗斯，讲述俄罗斯夏天的小麦和鲜花，冬季的暴风雪；草原上的太阳、青草、蜜蜂……他徐徐揭开了那块阻碍人们去了解俄罗斯的帷幕，使这些法国人了解他那美好、可爱、担惊受怕的人民。

在对所有外国人从不轻易相信的巴黎，屠格涅夫却“得到完全的了解和高度的评价，他拥有热烈的崇拜者”。1878年，国际文学代表会议在巴黎举行，屠格涅夫被选为会议副主席。他在会上专门论述了俄罗斯文学及其发展概况，论述了它丰富的内容及意义。

屠格涅夫在私有通信中曾使用过俄文、法文、德文、英文及西班牙文；用法文给波丽娜·维亚尔多写过歌词，而在他的创作中，他一贯用的还是“伟大、有力、真挚而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屠格涅夫曾写道：“您……以为，除俄语外我会用其他语言哪怕是写一行书吗？！……我认为，一个自认为是作家的人，写作时不愿意使用本国语言，那么这种人便是一个骗子

和一头可怜的蠢猪 。”

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一个年轻朋友爱好音乐和学习语言的劲头很合屠格涅夫的心意。屠格涅夫对他说：“您一定要学好俄语，我们俄语懂的人不多，但它很丰富。请相信我的话，您如果掌握了它，就会得到更大的乐趣 。”

在俄国，小说《处女地》问世后，屠格涅夫又受到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称颂和尊敬。屠格涅夫深爱着俄罗斯，俄罗斯也因此对他报以热爱。屠格涅夫在1877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我热爱俄罗斯，决不同于那些把她掌握在手中的老爷们 。”“没有祖国就没有幸福，让每个人都扎根在祖国大地上吧 ！”

1877年，屠格涅夫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他本打算写信给病危的涅克拉索夫，可是担心对方会把这封信误认为是一种报终的信号。后来得知涅克拉索夫想见他的消息后，便立即赶去看他。为纪念这次会面，屠格涅夫写了一首散文诗《最后一面》，该诗的最后一句是：“是的……死亡使我们和解了 。”

过了几个月，屠格涅夫忽然收到了多年来音讯杳无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希望忘却以往的口角，重归于好。屠格涅夫接到这封信很高兴，他回信说，他“极愿恢复从前的友谊”，并于187

8 年秋天回国后，到过托尔斯泰居住的雅斯纳亚·波良纳。不久，托尔斯泰去斯巴斯科耶拜访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还将他作品的译本发表在外国杂志上，给他寄来福楼拜对《战争与和平》的评论。

1881 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祖国，几个月之后，他在巴黎患了重病。病很奇怪，没有任何疼痛，就是站立不起来，不能活动。严重的不治之症使他卧床不起，作家产生了最痛苦的预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当您去斯巴斯科耶时，代我向我的房屋、花园，和我的那棵小橡树鞠躬致敬，——向祖国鞠躬致敬，我可能永远看不见她了。”后来，做了一次手术，病情并未减轻，原来他患的是脊椎癌。现在，不但不能动弹，又增加了疼痛。

1882 年 8 月，《欧洲导报》的出版者米·马·斯塔秀列维奇来看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给他念了几篇小文章，都来源于他近几年积累起来、作为以后创作基础的“初稿”。这些短小文章艺术上精雕细刻，内部结构完整。屠格涅夫曾将它们汇编成集，取名《老年人》。斯塔秀列维奇说服屠格涅夫将它们交付出版，屠格涅夫表示同意。于是这个新集子刊登在《欧洲导报》上，用了另一个标题——《散文诗》。因为这是屠格涅夫用清新明快的散文写成的一幅幅完整的充满诗意的彩画。

《散文诗》题材广泛，包括哲学、社会、心理，谈到了宇宙生活、自然界、爱情、死亡、故乡、美、功绩、友谊……诗集的主题是衰老、孤独和死亡。然而死亡压不倒爱的力量。散文诗《麻雀》最后的结尾是：“爱，我想，比死和对死的恐惧更有力。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

献给俄国革命运动巾帼英雄的散文诗《门槛》刻画了一个为了革命准备承受任何考验和苦难的女革命者形象。在立功的门槛上站着一位姑娘，一个“缓慢的、喑哑的声音”问道：

“啊，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的是什么吗？”

“知道。”姑娘回答。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甸甸的帘幕。

“一个傻瓜！”有人在后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一个圣洁的女人！”从某处却传来一声回答。

这首诗是根据对社会民主党人薇拉·扎苏利奇审判的感想写成的（薇拉1878年枪杀了彼得堡市长）。

而到1883年，人们就已经将它同俄国另一女革命家索非亚·彼洛夫斯卡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散文诗》问世后，尽管长期患病，肉体上备受苦痛，屠格涅夫仍怀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创作热情。当他已经不能再写字时，他向波丽娜·维亚尔多口授了一篇自传体特写《海上大火》和一个中篇《结束》——描述的是农民惩治一个已经变成小商人、小偷和骗子的新型地主的故事。

直到神智清醒的最后一分钟，屠格涅夫还在关心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他写的最后几封信里，有一封是给列夫·托尔斯泰的。当时，托尔斯泰由于进行错误的美学道德及宗教上的探索而放弃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屠格涅夫的这封绝笔信中写道：“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亲笔写信给你，是要告诉您，作为您的一个同时代人，我曾经多么高兴；我要真诚地向您提出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请回到文学活动中来吧！因为你的才能是天赋的。……啊，如果我能认为我的请求对您能起作用的话，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答应我的请求吧！……”这句句情真意切的话语体现了一个俄罗斯作家对伟大而光荣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热情。

1883年6月22日，屠格涅夫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溘然长逝。

在此以前不久，路易·维亚尔多已经去世。波丽娜·维亚尔多已经 61 岁。屠格涅夫临终前，波丽娜一直守在他身边。

屠格涅夫一生未有过自己的家。“家”对他来说，只能意味着俄罗斯。他在弥留之际，要求把自己埋葬在祖国的大地上，埋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